




# 現代政治思想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C. E. M. Joad 著  
夏葵如 譯

# 現代政治思想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 譯者序

本書的原名叫作 *Modern Political Theories*，若直譯起來，可說是「現代政治學說」，或「現代政治理論」。但依牠的內容看，叫作「現代政治思想」或更恰當些，所以就用了這個名字。

這書篇幅雖不多，然而從理想派的國家學說到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敘述到並極精確；對於歐洲今日流行之各種社會思潮，如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等，尤有較詳的記述，這是我們留心現代政治趨勢的人應該注意的。

而且著者不但敘述了各派的學說，並且指出牠們相互間的關係和同異；在最後一章裏，對於社會主義所引起的各問題復加以很公平的評斷。在我看，這些都是這本小書的特色。

最後，我還要指出的就是：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政治有兩個重要的

趨向：第一，地方代表制不但已生出許多破綻，而且也不能適應今日複雜社會之需要了，所以不論那一派都有採用職業代表制的主張。又一個趨勢即是：過分的中央集權，使人們對於政府發生厭惡，故現時各派社會主義——即集產主義也在內——均主張增加地方政府的權力，或是將國家職務分散開來。

這本小書，現在極細心譯成了；假若有什麼錯誤，我極誠懇的歡迎讀者的批評與指教！

民國十七年六月一日譯者於南京。



## 引論

在這本小書裏，我將竭力將現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提出綱領來，我的目的是敘述并討論這些各種理論，要使一般對於這問題從前沒有什麼研究的人也能了解。

現代政治理論是在一種混亂狀態中，這不僅因為所討論的問題帶有極大的爭端，更因為對於中心問題的性質及研究這些問題的適當方法也不一致。因此，敘述現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很知道有許多在政治學中尋常討論到的問題，在本書裏却少說及或至於無。理想派的學說僅佔了十數頁，而且所敘述的範圍只不過要使明瞭牠所引起的各種反響的背景而已。個人主義也同樣的被縮減了，法律與政治的關係更是沒有論及。在另一面，對於社會主義的最近發展我似乎佔去太多的篇幅了。這種不平衡的敘述，并不是對於理想主

義或個人主義的優點較諸社會主義的涵着任何輕視，而只是因為要將流行於今日政治理論的趨勢反映出來。

近年來出版的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大半偏重於討論社會主義的各方面，其中有許多是根於社會主義者立足點去寫的。就是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學者也費了許多功夫去批評牠。縱然社會主義不是在優越的地位，却也佔了興趣的中心；學者間今日最關切的問題，在理論方面為關於功能民主制(Functional Democracy)及其集團的人品之概念，在實際方面為這些概念所表現的社會主義之各種形式。

這些發展是最近的事，俱是十分重要，這不僅在牠們本身，尤其在牠們對於國家的權力與職務問題的關係。現在，牠們影響了國家實際活動，牠們在將來似乎會影響更大。即使離開了牠們的哲學觀點，而較詳的敘述牠們，於作現代政治理論概說的人也是極重要的。

我很感謝柯爾君(Mr. G. D. H. Cole)，因為他將第三，四，五，三章均校讀了，

并且给了我許多有價值的提示，爲我所採用了。

O. E. M. J.

(一)譯者註：詳見第四章基爾特社會主義中



570.1  
993  
(348)/2

# 目次

頁數

譯者序

引論

第一章	理想派的國家觀	一
第二章	現代個人主義	二一
第三章	社會主義——集產主義	三九
第四章	工團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	七一
第五章	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一〇五
第六章	社會主義之各種問題	一三五

# 第一章 理想派的國家觀

## 引言

理想派或絕對派 (Absolutist) 的國家觀為哲學上理想主義遺教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到最近，還可以說在英國政治思想上仍佔着優越勢力。這種理論最初的模型是在德國哲學家黑格耳 (Hegel) 的著作中形成，在英國因葛林 (J. H. Green) 而普及了，後更有卜桑葵 (Dr. Bosanquet) 為之發揮完成，在他的國家哲學論據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一書中，可以見着絕對派理論的完全說明。

近年來這學說在理論方面受了各方面的批評，同時還曾經擴張到國家實際行動——尤其在戰時——的半哲學的證論本身也引起一種不滿，牠引着人們從別種學說裏去尋求一種東西來替代這極絕對的國家萬能觀。所以今日有一種普遍的反國家



的偏見，這是我們在本書後面可以看到的。然而這理論在哲學方面極其重要，牠是根據於其哲學的前題而發展的，從前提出發到結論，除非把這前題推翻，這理論是頗難駁倒的。

在本章中第一我要指出這理論的起原，第二要說明主張這理論的人所持的要點，最後再將牠所受的主要批評提出綱要來。

### 一 絕對派理論的源流

絕對派的國家觀發生於兩種來源，這兩種來源起始均出現於希臘思想。第一認國家爲自完體 (Self-Sufficing Entity)，等于社會的總和。亞里士多德曾宣稱自完爲國家的特性，柏拉圖也完全抱着這種見解。提到別的國家的存在，他們總認爲國與國間的關係只有仇視。照葛林尼茲 (Greenidge) 的意見，一個希臘國家與別個國家的自然的或法律的關係就是隱然對敵，這也爲大家所公認的。哲

學家哥洛護 (Grosius) 主張「國家自由毫不受外界限制」的學說，而霍布士更說：「國家與國家是天然的仇敵」。

國家既被當作人類社會的全體，那末，許多學者所認為兩種不同的關係——即個人以公民的資格對於國家的關係和他爲人類一份子對於人類的關係——就常看作一件事了。因爲國家既被認爲代表并包括個人所有的社會意欲，同時又是滿足他的社會需要，所以國家對於個人無論什麼要求都根據于一種絕對權力。并認爲國家的要求高出于國家以外任何團體的要求。

希臘的人性觀念又爲絕對派第二種思想的起點。許多政治學者俱認爲一個人在有社會之前的某種「自然狀態」中即賦有真實的個性了。社會只是人爲的組織，即一種契約的結果，加諸在原人狀態上，個人所以加入這種契約，就是爲求終結「自然狀態」中不可忍受的擾亂。這種社會起原論即叫作契約說。

而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對於人性與社會性的見解却完全與此不同。



根據人是社會動物——或政治動物——的觀念，他們辯證人是社會性的，所以他天然適合生活于社會中。離開人羣的個人生活是一種反自然生活，真的個性只在社會中才能發展。就是說：個人必靠社會生活才能實現他自己的天賦，必與他人接觸以明了社會責任及盡力社會義務，他才能完成他自己。再加之個人受自國家保護安全，維持正義的利益，他對於國家這種賜與，自當盡其所有與所能以為報答。

## 二 絕對主義的說明

以國家為個人實際人格之保護者，或創造者的觀念在黑格耳哲學中擴張而且發展了。依他的見解，當人們棄去那種無規律的自然狀態而入到社會裏，他們為社會份子所享受的自由比離開社會的要真實些。祇有在社會中有的自由的可能。而且也祇有社會中能將個人心中最高的自由概念來表現和實現出來。這概念離開了社會決不能實現的。用黑格耳的說法，在國家中，人得以完滿的提高他的外

表生活與內心生活平行。在社會中存在的并由社會所產生的真自由是積極的，進步的。這自由第一在法律中，第二在個人所受于社會的內心道德觀中，第三在促進個人人格的社會組織與力量的全體體制中表現出來。

國家能使人得到用任何其他方法不能得着的自由。黑格耳說，「除了國家沒有自由的實現」。其所以能如此，就因為國家自身是真人格，有真意志。他既代表因契約而生活在一個社會裏的全體人民意志，牠就成了一新生體，比個人意志的總和還要高大，這就是公意（*General Will*）；牠又成了一新人格，超出于個人人格的總和，這就是國家的人格。個人意志與人格，溶合在公意與國家人格裏，即高出於原來的意志與人格了。

公意我們可以說是常在的，無論對於任何問題的決定，雖然在行動上尋不着真實的表現。因為牠是代表那個人意志與他人意志相調和的一方面，——這就是說，是那利人利己的意志，反乎那利己損人的意志——所以牠總是合理的，正當

的。牠是由全體意志最好的部分變化出來的實體，與純數學的全體意志相加是有區別的。個人意志既由公意中表現，所以個人可將他最高的思想實現出來。其結果，凡根於公意的國家一切行動，皆為代表個人意志最好的部分，總是不會錯的。

至於說到國家的人格，很顯然的：因為國家是一真實的個體，所以把牠當作目的本身，因為牠有牠自己的權利，所以與「所謂」個人權利衝突時，牠當然超勝了。此處用「所謂」兩字，是要使人們注意，當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利衝突時，個人並沒有實在權利。這就因為個人實在權利不是從有國家以前某種社會中帶來的，而是，因他的天性發展要用以追求與得到某種目的的權利。只是因為他是社會一份子，所以能從社會得到一種天性，並需要追求這些目的。所以，不僅個人所要求的目的必須靠社會負責，即追求這些目的的權利也是社會給與的。因為個人權利既受之于國家，所以當他的權利與國家權利相反時，他即沒有什麼權利了。

由以上關於公意，國家人格，和實在權利的性質討論總結起來，我們可以依照黑格耳的意見，說：國家見「一自有意志的倫理的本質，和一自知自實現的個人」（*Ase-t-conscious ethical substance and a self-knowing and self-actualizing individual*）。

從這種概念生出三種初見似乎互相衝奪的結論來：

第一，國家永不會有非代表的行爲。警察拘捕盜竊，官吏將他禁錮起來，這都是表現盜竊的真意志要拘捕與禁錮；因為這盜竊是國家的一份子，而國家必須代表他的真意志，警察與官吏不過是國家的執行者罷了。進一步講，因為個人從國家中得到的自由才是真實的具體的自由，與他在孤單生活裏所享受的抽象的，虛渺的自由相反，所以當盜竊被帶到警察署的時候，他是很自由的。事實上法律與自由間有完全的一致，因為真的自由只能由於服從法律而得到。

第二，個人不僅與同社會的別的個人有關係，更與國家全體有關係，並且這些

關係造成個人整個人格的一部分。沒有這些關係，他就不能成爲他了；他所以能成爲他，即因爲有這些關係。因此，他任何行動不能算是單獨的個人，而只能算是國家的一部份，他不能有純粹的個人意志，而只是國來意志的一部份。依卜桑葵的見解，即便在反對國家的革命中，個人所用以革命的意志，也不是除國家意志之外另有一種來源，還是從國家得來的意志，這是國家意志的繼續。簡言之，在革命期中，國家自身分裂了。

第三，國家包涵并代表全體人民的社會道德。正如國家中全體人民的人格被國家人格超過與溶化一樣，所以人與人的道德關係也被國家所賦予的社會道德超過與溶化了。這并不是說國家本身是道德的，也不是說國家行動受限於道德關係。因爲道德關係是涵有兩對方的，而國家却是全體的總和，在他本身之外，再沒有別的對方了。至於別的國家——即對方——的存在，這事是被忽視了，我們在前面已經看過。卜桑葵曾有表示這種思想的語：「國家本身是最高的社會，所以牠決

沒有什麼職務對於更大的社會負責，牠是整個世界的保衛者，而不是某種道德世界的份子。」他又將這些理論總結很乾脆地說：「要是國家犯了盜竊與殺害，就不能說國家能因此舉動而犯了什麼不道德的罪名。」

從這點再進一步，就是絕對主義的完全理論了。在平時理論上，在戰時事實上，國家對於牠的人民生命依法都操有全權。無論從理論上或法律上人民都沒有反對國家法令的餘地，因為被國家管理的人同時就是操國家管理權的人，國家的命令是出自服從牠的人民的真意志，縱然他們非自願的服從。在危急的時候，國家可以隨其所欲的做，至於怎樣才可叫作危急，那又由國家自定了。卜桑葵說，「於需要時候，——至於何時為需要，那依據憲法的規定國家就是唯一的判斷者——國家可以將全體人民的生命隨意處置。」國家萬能觀的理論，在戰時，真是得到牠的強有力的進展了。黑格耳說：「戰時的國家在牠的特性上表顯出萬能；國家與祖國是一種權力，牠可以將個人的獨立化歸烏有。」

眞的，若干英國學者拒絕接受這絕對派理論的全部，或者可以說，無論如何，對於德國學者柏挪第（Bernhardi）和屈茲克（Treitschke）的那種無情的論理是不會應用。葛林是前面曾經說過的實際權利理論的代表者，他以爲在許多權利中個人保有一種生命權（Right to Life）。這種權利在戰時顯然的被那國家權力絕對說所侵害，於是葛林歸結到戰爭至多不過是相當的，有理由而不是絕對的有理由。在他看來，戰爭不是完善國家的一種品德，而只是未完成的國家的品德。然而無論如何，葛林並未去解決這說法所引起的問題，就是對於實際戰爭，個人有否對這戰爭認爲無理由之判斷權，而不願自己和別人去加入戰爭，以實在的生命權爲孤注；更沒有理會到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倘使個人認某戰爭是無理由時，國家是否有權可以蹂躪他的生命權。

現在暫把若干英國學者對此理論所加的若干修正不顧——而所加的修正實是不一貫的——於是這理論的大概趨向是很明顯的。國家是人類組織中之自然的，必

需的，和終極的形式。到發展完成了，他是萬能的，絕對的，所有現在的國家不過是參有完全發展的國家之一部罷了。使國家不能成爲萬能的諸點皆被駁斥，所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減損於國家的權而是要增加國家的權。國家有牠自己的真意志，真人格，牠們既由個人人格與意志最好的部份而造成的，故即使不賦有道德，至少也賦有半神明性質了。因爲國家將他自己的超絕性與犧牲性加諸人民，所以牠能擴大他們的人格，清洗他們的私心與惡念。黑格耳說，「國家把好自私爲中心的個人吸引到萬有物體的生活中去。」

從來所有國家固未嘗執行過這種職務執此而起反對者，絕對主義派必答道，他所形容的并不是現存的國家之行動，而是理想的國家的品德；這樣的說法於絕對派是很自然的，因爲照他看來理想的國家才真是國家，其餘的國家——一切夠不上稱理想的國家的——簡直不是國家。



### 三 絕對主義的批評

在近代政治思想上絕對主義的國家哲學，引起了很明白的反響，這是我們在後面幾章中有機會指出的。這哲學在理論上不穩固，在事實上不真實，而且於現在國家的外交政策方面很易引到極危險的行徑上去。這理論之反響在許多方面竟進到完全反對國家存在的需要，或者是反對國家主權所在的機關。現在且簡要的先研究對於這學說之理論上的反駁。然後再及於牠不曾注意到的事實問題。

A 理論上的反駁 武斷國家等於人類社會的總和，在事實上顯然錯誤了；由這武斷無意中生出來的許多結論也被破壞。就假定國家對於他自己的人民有全權的，——這只是根於國家意志為代表并超出組成牠的份子意志之斷論，這是很顯然的事。這樣，國家當然並沒有代表別國的人民意志之解示；那末，對於別個國家的人民就不是全權了。因為全權的要求更進一步實用到道德限制的免除，這免除無論如何不能擴張到國際關係上去。國家對於其他國家的關係確不是一整個世

界的保護者」，而只是「道德世界的一份子」。結果，一國與別國的交涉，如國家以外的自由組織與別個同樣組織的交涉一樣，也不能免去道德的制裁。

假使事實上道德律被認作人與人關係的標準，那末，就沒有理由去否認牠是羣與羣關係的標準。這點承認了，那就很難說國家「犯盜竊與殺害」的事而還未違反道德而與教會或職業團體在做這些事的情形有什麼不同。

然而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果有什麼根本差別麼？我們可以承認這說法，一個人必得參與社會才能發展他的全部天才，而且僅生活在社會中，才是真的自由。

被流放在一個荒島上的人雖能享受自由，然而這只是抽象的自由。雖然他無論做什麼事都不受限制，但實際上他什麼事也不能做。但是承認這理論并不一定就要承認國家萬能觀。國家是為個人而存在，個人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自由只是為個人才有意義，所謂社會與國家的幸福是無意義，無價值的，除非是使組成牠的份子的個人得着幸福。換言之：國家與社會并不是目的的本身。

明白了這一點，那末，不論任何政治學說，牠若承認離開或犧牲個人幸福還可以完成國家幸福，並且說這承認是以國家人格能包括和超出個人人格爲立足點，這是回到從前的舊思想上去了。贊成這學說的人對於這種批評的反駁是：國家犧牲個人幸福或壓制個人去提高牠本身的幸福是不會有的事，因爲國家幸福就是個人幸福，國家意志，縱然是專制的，也就是在專制下犧牲的個人的意志，這反駁是不合理的。反乎我自己意志的團體決定當然不能算是我本身的決定，雖然我是團體中的一份子。同處在一國中的人民，因民主政治的應用他們的意志決不會與多數之決定相反，正如一棒球俱樂部的委員會裏少數倘與多數意見相左必定要落選一樣。

我自己不能知道的實在意志與我自己所常知道的非實在意志，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大家所公認的實在意志，無非是指我所屬的團體將牠的多數決定執行出來的意志，縱然事實上我明明知道這決定是錯了。因此，我們很難逃出這結論，那

就是：使個人必須服從他所溶合在的公意之實在意志，牠的用處不過是給正義與民主政體一個護符，好避免君主國家純然專制的名義罷了。絕對派的國家觀事實上是與個人自由不相容的，因為當個人與國家衝突的時候，牠總認為國家一定是對的。

懷疑個人意志與國家意志總是一致的觀念，這也并不就是暗示牠們總是相反的。此處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去使社會與個人間的要求和相反的要求之平衡，而是要斷定怎樣與何種組織才能使個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

B事實上的攷慮 說到事實問題，首先當討論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私人為特種目的的自由結社之數目的激增，這於絕對主義者是需要注意的。這些結社大概可分為兩類：經濟目的的私人結社與倫理目的的私人結社。

因交通便利經濟目的的結社一天增加似一天，從經濟立場看來，這些結社已構成今日世界的社會單位了。雖然政治上分作許多獨立的國家，然而在經濟方面已

證明人類社會是一種有機體的關聯，這關聯在政治上理想派認為是國家的實質；這就是說，社會上任何一部份人的經濟幸福都是依在別人幸福上的。安格耳（ZOLLER and Angell）說：「電報事業造成今日文明世界的信用制度，這信用制度即含有各國的經濟關聯。」

經濟結社增加的勢力，從現在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經濟組合漸漸代替了從前以居住為基礎的地方組合中可以看見，在往日後者是造成人類社會之主要的基礎，縱然不是惟一的。在今日社會中，一個以販賣和輸入巴西（Brazil）橘子為目的的公司之股東，他對於那些栽種與輸出橘子的巴西人之能力與隆盛比對於一位住在倫敦城外的鄰人更為關心些，對於後者他也許不認識，假若他先前認識，現在也許厭惡他。

這種人類社會成因之性質上的變更，與隨之而生的個人之利益的變更，至少可以說是預示將來以基於經濟相關的社會組織來代替現在基於地理接近的區分為可能

了。

倫理目的的結社也是同樣的情形。因為十九世紀個人主義思潮的結果，對於希臘的那種道德觀：以為個人的善良生活只有一種或最多不過兩三種，並且提高這善良生活是國家的職務，現在業有一致否認的傾向了。正相反，我們認為善良生活的概念是無數的，跟着個人的天性而變化；而且由這些概念中去選擇應該在乎個人，這是很重要的。靠了個人每個時代之渺茫的熱望與宗教的情感才得着表現，行為和信仰的自然比一致更為重要些。

現代生活複雜和方式的增加引起了宗教需要的同等複雜。這些需要不是單一的國家宗教所能滿足的，所以倫理與宗教的結社隨之蜂起了。這些結社和前面所說的經濟結社一樣也是不分國界的。例如：理會派 (Theosophical Society) 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是包含各國人民的。

因為這些結社的影響，人民遂傾向以他們自己的私的道德去代替國家所規定的

公的道德，結果，從道德立場上對於國家干涉他們所認爲的善良生活之追求懷疑了。社會生活，尤其是從政治方面表現出來的，只注意到道德的最低標準，并不問私人道德的造詣。僅國家法律的表面監督決不能達到道德的高點，所以一個守法的人不一定道德很好的，一個造法的人反常是不道德的。

在這樣環境中，遇着道德問題的要求衝突時，個人不但要求有自決的權利，并且漸漸傾向視他自己的倫理的或道德的自由結社之要求在國家的要求之上，這是不足驚怪的。

我們可以總結的說，理想派的國家觀忽略了一部份重要事實，引卜桑英的話爲例，他曾說：「當需要的時候的到來——至於何時爲需要，那根於憲法的規定是唯一的判斷」——，國家定要「禁止任何忠心行爲的表現，除非那忠心是對於國家的」。

理想派的理論尤其忽略了這事實，那就是：前面說過的自由組織現在已籠罩着親密的個人生活之全部，每種有益於他的物質和精神之活動，現時都在與國家不同

的組織中做出來，并且這些組織內含着——其實是造成——社會的基層，與基於地域的國家分界不同而且相反。

雖然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間國家外表的活動大大增加了，但實際上國家已被逐出個人生活之外。其情形已到了這地步，常人與國家發生關係只在他納稅，做陪審員，或投票的時候，這些職務是比較不常遇着和有限制的。由此可推論到一種政治哲學，牠若是在牠的範圍內承認國家以外的團體之存在，重視這些團體對於國家的關係，使牠們之間相反的要求得着平衡，并且規定牠們各個的職務，那比理想派以國家為一個孤獨的自完體，使牠不能與別的自由團體發生外交關係——因為這些關係都包括在牠那高象的構造中——要合乎社會事實得多了。

從理想派的國家觀引起的反響構成兩種形式：或是承認公意與實在人格說，不過遺承認僅及於個人的集羣和團體，而不是國家；或是根本否認公意與實在人格的存在，認其為玄學的空想，國家不過是一架做事的機器，牠將來會有一日被更完全



的自由組織所代替。

藏在這兩種反響下面的仇視國家的態度，從各種學說中的各方面表現出來了，這些學說的研究就是本書以下幾章的主旨。總括的說，現今的趨向是着重羣的實在生活和人格（The real being and personality of group），在次章和第四章基爾特社會主義中，我們可以看出絕對派所要求的許多國家職務都變歸基於自由組織的羣裏去了。

## 第二章 現代個人主義

### 引言

個人主義成爲一種社會或政治學說是十九世紀的產物。首先演成牠的十九世紀之形式的爲邊沁 (Bentham) 與傑母士密爾 (James Mill)。至十九世紀中葉，牠更在約翰密爾 (John Stuart Mill) 和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著作中得着極完備的說明。從一八八〇年以後，牠的勢力就漸次衰落，在十九世紀末年，牠大部爲絕對派的國家觀所替代了。

一部現代政治思想概論的書，嚴格的講，不必敘述那維多利亞 (Victorian 英女皇名) 時代的個人主義。但同時將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之要點綱舉出來，實便於看清現代個人主義的地位和它與舊個人主義的系統關係。

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 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之最有特性的說明可以在約翰密

爾的自由論 (On Liberty) 和代議政治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二書裏

找出。同別的樂利派思想家一樣，約翰密爾也是反對那些政治的抽象論的，這些抽象論都是前章所說的絕對主義之完全發展的結果。他認為每個問題都是關乎人類的幸福或痛苦，而不是如律師或黑格耳派所說，關於一種抽象的東西，如公意和國家人格之類。他承認絕對派所辯護的國家是一種自然生長或有機體，也承認僅在國家中個人才能享受他天性所能有的完全幸福，但他却指出這種承認並不是說國家不是為個人幸福而存在的。他更進一步結論到：政府責任在積極的提高個人幸福，假若不能做到這一點，牠就應該讓別種組織來代替牠。

約翰密爾的主要論點是：國家為維持個人幸福計，最好儘可能的限度內不干涉個人的事務。這尤其注重思想方面。在一切著作中，密爾的自由論是思想自由之最著名的辯護文，是提倡容忍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各種意見之最有力的辯證。他主張思想自由推及到「神經病人」(Crazy)，理由是：即使十個神經病人有九

個是白癡，而最後那一個對於人類的價值也比那些想壓迫他的人要大些。就是這樣的一個也爲密爾所要保護的，不僅要反對國家的干涉和壓迫，並且要反對公認的輿論之裁判。密爾對於暴民思想和羣衆專制有一種特別的恐懼，因爲這思想是被一班野心家的機關報所造成之偏見和眼光。

他所爭辯是：輿論反對某種意見，並不是就指政府有權利去壓迫持那種意見的人。因爲政府的責任是在提高幸福，而且這幸福是指個人幸福而言；那末，顯然的，政府就無權壓迫少數人的意見以危害他們的幸福了，縱然此舉爲持相反意見的有結合的多數人所擁贊。密爾說：「人類能容忍各人照着各個人自己的意見去謀快樂，比較各個人要強迫別人一定要照多數人的意見去謀幸福要有益得多。」

不過辯護思想自由是比較容易的工作。而最重要和最困難的是建立表現個性之行動自由的權利。密爾稱行動自由爲「人類幸福的基本原素之一，同時又是個人與社會進化之主要原素。」。密爾要求凡不影響社會的事，個人行動須完全自

由；而影響於社會的事，社會才有權利干涉個人，假若他的行為是有害於社會幸福的。社會對於影響牠的幸福之事件有干涉權利，密爾思想自由的辯護也是受這種限制的。

密爾的關於自身行動與影響他人的行動之區分，遭受極嚴厲的批評。批評者曾指出這兩種行動是一樣的，不能在牠們中間劃出界線來，因為我們都是社會的份子，所以我們的行動總要多多少少的影響社會上別的份子的。不過密爾并不是呆子，他決不會想他的區分能如數學的正確。只要這區分能作實用的大概標準，和證明行動自由為原則（除非相反的方面有更好的理由），以便矯正前章所說的那絕對主義之反個人的偏激，這於他就足夠了。絕對派的理論視個人實在自由與國家意志相一致，所以含有一種錯誤的區分，那就是：以個人所知道的與所享有的為表面自由，而他所不知道的與國家所享有的才是實在自由。個人主義更為指出，即使國家不會錯誤的要求在理論上被承認了，而事實上國家離不錯誤太遠，這是顯

然的事。國家是官僚武人的集體，他們有時是聰明的，有時也是愚笨的，決不能成爲全能，正如他們所要壓制的個人一樣。密爾並且說明任何學說，牠若認爲這些官吏知道什麼是有益於個人的或什麼是構成個人自由的比他自己知道更清楚些，那簡直兒是蠢話。

密爾的個人主義趨於一個通常的結論，那就是國家最好不要干涉人民也同人民不要干涉別人一樣。這樣說來，個人主義就是一種管理自己的主義。站在這樣穩固的基礎，牠要進而表現儘人類可能的最高之政治欲望。結果，各人視政府爲一種障礙物。那末，我們有時遂成爲無政府主義者了。無政府主義我們若詳細研究牠，也不過是：要求密爾所說的個人完全自由之精義，反對他所認爲國家不可少的主權，和不承認自身行動與影響他人行動之區分的重要罷了。

即使拋開這種區分在實際行爲上的困難，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還有兩大缺點，這缺點引起了三四十年來反對個人主義的潮流。直到最近幾年，個人主義又顯出

新生的花樣，這就成爲個人主義之現代說法，這說法是密爾的精神所鼓起的，恰用來防護他的理論所顯示的危險，這就是本章中所要討論的。但是我們首先要討論的，還是舊個人主義引着人實際離開牠的那些缺點。

### 反對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之理論

(一) 斯賓塞將達爾文的進化論中生物學的概念滲入密爾的個人主義中，遂造成一種新色彩。他認國家起原於契約，如一種有限公司然，他并相信——不過有點不一貫——社會如一種進化的有機體之學說。在這樣有機體中，爲全體利益計，那些不中用的份子都應該排斥，而且寬容他們的弱點使之延長下去，也不是別的份子的職務。以達爾文「適者生存」的成語爲起點，斯賓塞遂進而反對國家之救濟貧人，和爲了不幸的人而費去大家的努力。他認爲進步是要消滅那些落在生存競爭後面的人的。密爾學說的這種發展實涵着野蠻人之倫理觀的再現，這不僅使個人主義在許多公正人的心目中失去信仰，並且在經濟方面產出非常重要的結果來。

(二)在這方面尤為明顯的，就是個人主義已證明不合時代的需要。自由學說的重要在政治學中固然不可過於抬高；而將牠應用到經濟學上，結果更為不幸了。

邊沁曾說過人類根本是自私的，所以最好讓每個人去照顧他自己的利益。一個人知道他自己的需要的比任何別人更清楚，所以他追求他的所需要比任何別人為他而追求一定更盡力更持久些，這理論在這種信念中得着表現，那就是人與人的交涉不希望也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干涉了。這種社會學說與當時經濟學結合起來，遂產生了完全的放任主義(The complete doctrine of *laissez faire*)。以他們相信經濟學的教條為基點，個人主義派遂主張在經濟方面人與人的交涉之外界干涉，不但非所希望的，而且也是無益於事的。工資律(The iron Law of Wages)供求律(The iron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和從經濟學教本上選揀下來的許多別種定律都用來證明國家對於工資和生產的糾正均因生產自治的勢力之進行而化



爲無用了。所以一種政策使人與人的交易不受阻礙和限制，這不但與個人自由學說相一致，而且爲物性（*Nature of things*）之所必需的。

從政治方面看，自由主義自有其可取之處——一種不干涉政策比諸國家派檢查官到各家裏去干涉一切個人事件自然好得多——然而在經濟方面則必生出不幸的結果來，這結果，遂造成本書後幾章所要說到的各種社會主義之勢力。個人主義所以生出這些結果，就因爲牠基於三種錯誤的觀念：

- (a) 每個人有同等的先見和同等的本領知道什麼是他所需要的。
- (b) 每個人有同等的能力取得他所需要的東西和同等的選揀自由。
- (c) 各個人需要的滿足與社會全體的福利相一致。

曼切斯特派（二）的個人主義不明瞭以上觀念之錯誤，結果十九世紀個人主義僅僅造成了生存競爭制度。「自求多福，天助其後」（*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the Devil take the hindmost*）的格言到底不能造成善良社會之適當基礎，

因牠的實際應用而遇着的困難，遂引着國家採用一種干涉經濟和實業事務的政策，的確，國家活動於各種公共生活中只這一方面是在繼續增長，這一點形成了二十世紀初葉的特色。

(二) 譯者註：曼切斯特派 (Manchester) 是指經濟學派中主張自由貿易者，此派發源於亞當司密司 (Adam Smith)，最初將牠應用到政治方面的為狄司拉里 (Disraeli)，贊成而且宣揚者為哥布登 (Richard Cobden) 和萊特 (John Bright)。因起初在曼切斯特 開會討論此事，後遂以此得名。

這種國家職務的增長，一半由於前章所敘的絕對主義之影響，一半由於集產主義派的宣傳，後者就是本書次章的題目。但是個人主義的反動又引起循環的反動。這輪轉成爲圓形，現時對於國家的不滿促進個人主義思潮的再生，雖然形式上和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相同，而精神上却是一貫的。

促進現代個人主義生長的因素

(一) 國家關於公共生活方面的職務雖然增加了，但干涉個人生活的事却逐漸減少。前面所說的經濟目的和倫理目的的自由組織之加多，使人想到國家不過是個人所屬的許多團體中的一種，而并不是最重要的。牠對於國家也不一定是最忠心，牠對國家所表示的同情，也不一定是最熱烈的。除家庭之外，國家是惟一的非由於選擇而出於必然的團體。一個人可以選擇他的足球俱樂部或工會；然而他生來即在國家中。

(二) 當戰爭中交戰國家的政府活動之特別擴張，也特別引起仇視國家的情感。國家對於個人的使喚越繁多，個人越發懷疑國家權力之根據。使他更易於走入此途的，即因為戰爭事實多是由於現代國家的暴力與不負責的外交所造成的趨勢，這種國家權力是黑格耳派的國家觀認為正常的，我們在前面已見過了。同時，國家在內政方面之各種勢力的專斷，個人自由的阻害，官吏數目與權力範圍之增加，在在給人民對於這種政府的不滿，這是一種十足的官僚政治在組織很好的國

家中所定有的。

(三) 戰爭與戰時心理更引起對於多數政治的危險之恐懼。個人對於羣衆之專制需求一保障，於是必須加入獨立派或反抗派之少數者的隊伍中去，以便打破那種由單調而生的不可耐之苦痛，免除暴民思想的專制。被報紙造成的和顯示於報紙中的羣衆壓迫與輿論權威之整個的社會勢力，立刻形成了暴民專制的恐慌，這專制阻礙了密爾所重視的那種天然個人發展的可能。因此，一種政治學說若第一能認識國家主權被多數人頂了國家名義去行使，是對於全體幸福無保障，第二能竭力將國家的權力與職務儘可能的限度內分散開來，以便保護個人避免羣衆專制，這種進展是極其重要的。

現代個人主義 有好幾種思想我們都把牠們歸在「現代個人主義」名詞之下，牠們在別方面雖有很多的不同，但却顯出同樣的努力以奠定這種理論的基礎。

(一) 安格耳在他的大幻想 (The Great Illusion) 一書中所提出的許多觀念，

在歐戰前也曾喧噪一時。這些觀念後來在若干事實上證明是錯誤了，但牠們被誤解比被反對更利害。安格耳的主要爭點是：人類社會的組織是基於經濟利益的共同感覺，這不但與國家的和地理的分界相衝突，而且時常超過這些分界。這種社會利益的共同感覺的基礎是：人民常是做於經濟上最便宜於他們的事。現在，因為事實的誤解和競爭的諸國家之國民情感的養成，人們對於什麼是有益於他們的事却執着錯誤的觀念了。但安格耳指出明顯的事實道：「於人們最有利益是人們要想自己是世界統一的和平社會之一份子，若是想自己是屬於互相對敵的互相鬥爭的社會，那一定就無利益。」

人類不會永久不認識這事實的。當他們認識了這事實的時候，他們定將拋棄現時以民族區分的社會，而代以基於利益的經濟組織。這種結果也不能認為不好。人們為自己打算是聰明的；但一到他們以國民的地位為國家策畫就很不聰明，結果，造成世界上許多的不幸。安格耳曾憂慮的說，「事實昭示的是：一個

人爲愛國心所驅使，在政治上的行動卽沒有理性與責任心，這在他的私行動中決不會有的」。由此看出安格耳視國家只是一種辦事的機器，既認這機器的目的是爲促進人類利益的，那末，牠就會被更好的機器所代替。因此我們可以預想將來定有國家溶合到基於經濟分野的大同社會之一日。

誠然，這種發展的結果會發生以經濟爲分野的階級戰爭來代替現在以國家爲單位的愛國戰爭；但這改變至少可給人類一種社會組織，使個人得以滿足并表白他的實在需要，以代替誤解與悶壓。假若階級戰爭還不能達此希望，那末，一種較好的方法或者可從基爾特社會主義派（Guild Socialist）的理論中找出來。這些理論全部的接受了安格耳對於國家的批評，但與他不同的卽是關於社會的組織，基爾特派雖然也主張縮減國家的職務，但是要以合作去代替經濟方面之爭鬥的。

（11）瓦來司（Mr. Graham Wallas）在他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裏說到代議政府的問題，也是同樣的不信任這發展過分的國家權力，但結論却不與安

格耳一致。將生產工具從私人手中轉交於社會公有這是社會主義者所辯護的，不過這轉交是毫無價值的，除非是管理工具的公共機關實在是那操有工具的社會之代表者。於是瓦來司發生疑問了，就是以議會為牠的表示機關之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究竟能不能顯示出最有力量的羣衆心理呢？

在一個中央集權國家，選舉以地域為基礎，而選舉機關又為一班官吏所操縱，這是很容易發生重大流弊的，這足以使人民意志對於什麼是最好的和什麼是最壞的不能得着適當的表示。一般選民都被報紙所催眠，被廣告所麻醉，被那些所謂候補人的「德惠」(boonings)所昏迷了。如一九一八的英國選舉一樣，選民可以被那些造成而且操縱輿論的機關之暗示所影響，牠容忍甚至於鼓勵一種仇恨行為，這行為是個人在他的私德上以為恥的。選民又可以被有勢力的財團所賄買，依着計劃去投票，只要這計劃於所說的財團有利，縱損害於公共幸福也不顧了。

所有這些危險，包圍着以選舉議員為目的的羣衆非常利害，他們并不知道選舉

以後他們對於議會絲毫不能控制的。

瓦來司於是提議選民應該依職業分成許多團體，每個職業團體舉出第二院的議員，這第二院應該完全是各種職業代表組成的。但是下議院——即第一院——還應留作純然依地方而選舉的。此外還有一種提議，就是爲實行特種事務起見，在基於地方選舉的議會中再參入由職業團體所委派的少數代表進去。瓦來司的這些提議，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個人對於無限制的多數專政之危害能得着安全的保障。因爲國家的壓迫還不如暴民思想專制之利害，這後者尤爲他所恐懼的。

(三) 柏勞克 (Mr. Belloc) 在服務的國家 (The Servile State) 一書中，曾有贊成回復到中世紀基爾特制度的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更從而發揮之，他們都把社會當作兩種團體的聯合，一是代表生產的，一是代表消費的。現在的工聯 (Trade Union) 和合作社 (Cooperative Society) 就是雛形，那種社會的組織將來可由此而發展到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提議或是現代個人主義的態度之極顯的



說明，在後面另一章裏再去討論牠。

上面這簡短的綱要，可用來指明政治趨勢的幾個要點，這些就是我們叫做現代個人主義的。現在把牠們歸結於后：

(一) 一種反智慧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 的傾向大概趨於反國家，更特別反對黑格耳派與集產主義派的國家觀。這種反智慧主義由三方面表現出來：第一反對具體的理性的提議；第二相信「未來」遵着牠自己的軌道去進展，不會受政治理論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之影響的；第三信任當任何新境遇發生時，本能足以應付牠。工團主義即抱這種態度。大概說來，國家不是從道德立場上被否認，即是從經濟立場上變成別種組織的附屬品了。

(二) 承認羣的眞人格。由於黑格耳派的辯證，建立了國家人格與公意的存在，前者超出組成國家的全體之人格，後者也與全體意志的總和不同；於是遂進而推斷到：假若這辯證能適用於國家，那末，實用於別種團體也應該有同等的效力。

工聯，學校，教會，甚至於足球會都和國家一樣的保有人格，這人格是爲牠們的份子之意願所造成的；因此也就有權利要求他們的忠心與服務了。當這種忠心與個人對於國家的忠心發生衝突時，也不能從國家方面或自然事實方面得着正當的理由，認國家的要求一定高出一切的。無論如何，在這兩種衝突的要求中，應該完全聽個人去選揀。

(三) 認國家只是各種羣的聯盟，各種基爾特的組合，社會的社會，或一架辦事機器，用來處理兩衝突團體之活動與要求的，牠本身并不能供給人類精神方面之任何需要，爲他種組織所不能滿足的。

這樣去看國家，牠自然不會是不可少的東西了，一旦社會上羣的組織能完成管理事件的職務，使羣的利益不受損害，牠就定能代國家而起了。

新個人主義與舊個人主義的不同之點，就是前者是以羣而不是以個人爲政治的單位。所以採取這種意見，就是要保障個人以免除(一)私有的經濟利益之榨取

和（二）多數專制的輿論之壓迫，這一點為舊個人主義所未顧及的。羣的組織第一是在自保，第二是維持牠的份子所共有的某種利益或理想。因為羣是比較小些，所以牠可以給人發表共同意志與個人人格的進展之機會，這是在這樣大的國家中所不能得到的。

因此，認羣的組織不但能做從前國家的職務，能發展個人的真人格，而且是個人自由之惟一有力的保障，保護自由又是形成密爾的舊個人主義之最有價值的成分的。

至於社會的羣的組織之方案，在後面基爾特社會主義一章裏再為詳敘能。

## 第三章 社會主義——集產主義

### 引言

在一個很小的篇幅中想給社會主義一種周到的敘述是一件很難的事。這困難

第一由於「社會主義」這個字用來不但指一種學說而且指一種政治運動；因此，縱然我們只注重研究社會主義學說，但是想把社會主義的各種組織之特性完全拋開，這是不可能的。第二由於普通所謂社會主義一名詞，並不是全部的或主要的指政治而言；牠已經擴張到經濟方面，經濟的與政治的理論交錯如此密切，使我們的敘述若只限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方面，不但不實用，而且也不可能的。

第三種困難就是由於社會主義者爲了他們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自身分成許多相反的派別。這些派別均有相當的重要，他們所根據的理論都有明顯的分界，因爲這些主義的贊成人各有他們的派名：他們不是籠統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工團主義

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的這些發展後面再分章討論。敘述社會主義遂因觀點差異而有顯着的不同了。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認社會主義爲個人主義的一種反動，我們也可以把牠當作馬克斯（Karl Marx）學說的注釋。因爲各種研究社會主義的方法注重點不同，其結果也就表出不同的色彩來。社會主義在各派創始人的心目中卽定下不同的理論，更因各派辯護人的性情與他們辯護的爭點不同，所以社會主義比任何學說更爲分歧。而且社會主義的辯護者非常之多，其中有不少都是第一流的政論家，論題很是廣大，使人很難說出那一部份確是社會主義。簡而言之，社會主義像一頂帽子一樣，因爲人人都戴牠，所以失了牠的形狀了。

同時，無論各派社會主義者所採用的方法如何不同，然而總有一些目的是他們皆認爲必要的。還有一派社會主義的思想叫做集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雖然近年來漸遭反對，但牠却形成社會主義的中心並爲各派理論的分點。

所以本章專門討論關於集產主義之公認的一般基本理論。

現在先研究社會主義的前身，再記述牠的社會與政治哲學，最後再說明牠所表現的幾種具體的主張。我們更要儘可能的限度內，揀出爲各派社會主義者所公認而很少改變的那些主張來討論。

### 一 集產主義的前身

A 馬克斯的著作 嚴格的講，馬克斯是社會主義的創始者（一）。在馬克斯以前當然也有不少的理論家，因爲不滿意於社會現狀，他們曾想造成一種理想國以發洩他們的不滿，在那種理想國度裡，財產公有，非正義之事也是絕跡。從這一點看，柏拉圖的共和國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國家。有些社會主義者例如歐文（Robert Owen）爲求他們的理想之具體表現，曾有模範社會的建立，使這裏居民均得享有他們——理想社會的建立者——所認爲的人類最好的生活。然而這些試驗都完全失敗了；這班所謂社會主義者除歐文之外，在馬克斯以前可以說

從未注意到他們的理想社會如何實現的問題，或那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理想社會實現了，又應如何去繼續工作。他們中間的多數都富有社會理論家的那種高尚的信心，與歐文和傅立葉（Fourier）一樣想法，他們只要引起人類注意到他們的完美計劃，人類就一定會被迫切的欲望所驅使將這些計畫實行出來。不用說，這些烏託邦的理論家之生活都充滿着失望的。

（一）原註：這種說法對於英國社會主義只有一部份能適用，因為馬克斯是歐洲大陸與英國社會主義的分點。英國社會主義的宗師尤其是費邊派，是歐文、萊士金（H. O. Paine）和羅士金（R. Owen）等人物。

馬克斯是第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他不但將他所希望的社會刻畫出來了，並且詳細說明這社會進展所經過的階段。

馬克斯的學說雖然於工人階級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它是很玄奧的。對於這學說的正常解釋就發生了很大的爭議。因為解釋的不同——由於他的學說本身多不確定——遂變為各派社會主義的分點，這是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的。

現在我們只略述馬克斯的兩個主要理論，至於牠們的發展留待後面再加討論。這兩種理論就是：剩餘價值論，和唯物史觀。

(一) 剩餘價值論 馬克斯全部接受了十九世紀正統派經濟學的理論，認勞力為價值之源，他更從而光大之，由此而得着結論，這些結論與那班經濟學家的恰好作一反比。馬克斯說明價值說如下：

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無非是商品。這些商品都有價值的，他們的價值與他們供應人類需要的量——換而言之，與他們的效用——成比例。我們對於一物，可以從牠能交換某物而估定其效用（*usefulness*）的總量，所以馬克斯用「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的名詞來說明物與物間實值。這「交換價值」通常以「價格」（*Price*）為代表，可以隨市場情形而漲落；但是這漲落是偶然的，決不能取消或隱蔽商品的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實在性。價值的實在性就是物品生產所費去的勞動時間之平均率。而勞動時間為商品生產之必需因子，所以遂成為交換價值



的實在標準，「恍如一種超自然律」，（Like an overriding law of nature）縱然交換價值也有人爲的改變。

但是勞力自身不能造成價值，牠必需用工具，沒有工具，勞力就無所施了。這些工具就是機器，工廠，蒸氣力，電氣力種種。

因爲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科學發明的結果，創造價值的工具在量與質的兩方面都激增了，而且這些工具爲少數階級所有，這就是資本階級。資本家收買工人的勞力，將牠用之於他所有的機器和原料上，結果產生一種有交換價值的商品，這就是說，一種商品出賣的價格大於生產時所付的工資與工廠消費二者之和。這商品的交換價值與付諸工人的勞力價格間之差卽爲剩餘價值。牠爲工人的勞力所造成，而享受之者却是僱用他的資本家；這就是未付值的生產。

資本家獨享這剩餘價值造成現代工業制度的根本罪惡，這罪惡爲各種社會主義所要去掉的。事實上，資本工業制度與奴隸社會只是形式的不同。奴隸被強迫

而工作造成剩餘價值；現代工人造成剩餘價值不過是在他自願結的一種契約之下罷了。但是因爲工人沒有生產的工具，事實上他除了將他自有的商品——即勞力——賣與資本家外，別無他法。資本家在付他一種僅能生存的工資之後，什麼生產都轉入他私囊了。

(二) 唯物史觀 馬克斯於是進一步去探求：何以組成這樣的社會，使少數特權階級獨享工人勞力所造成的剩餘價值而爲法律所保護。他對於這問題的回答根據於唯物史觀。認經濟因子爲決定歷史事實的，馬克斯爲第一人。在先，前別人把這些事實都解作個人野心，宮庭詭計，或政治侵略的結果；而馬克斯却力持在一切政治趨向的下層，最後都可以找着經濟的動力。這樣解釋歷史，希臘人之攻取托落埃城，並不是密尼拉斯對於誘拐海倫的巴里之復仇，而是希臘人想向東方開闢一條新商路(三)。所以歷史到底爲經濟勢力所決定；人類社會進化的每階段都是外界物質進化的反映。

(五)譯者註：在希臘神話中，密尼拉斯 (Menelaus) 爲拉達達 (Lacedaemon) 之王，他的夫人海倫 (Helen) 被巴里 (Paris) 所拐去，遂造成特洛伊戰爭 (Trojan War)。後來在荷馬 (Homer) 的 Iliad 詩裏，密尼拉斯 表現得十分勇敢，將巴里 打敗了，並將特洛伊城 佔領，取回海倫。

經濟生產發展到某階段，必定有一種相當的政治形式和階級組織隨之而生。

因工業革命而發生的十九世紀初期之經濟大進展遂造成(一)小數的特殊階級——即生產工具之佔有者；(二)多數的無產階級。在工業革命之前，當然也有僱主與工人；甚至也有少數資本家，但是現代社會的特點即在資本家的統治形成一個階級，即在國家的組織就是這種統治的表現，和在經濟方面資本家與無產階級恰成對峙。這種仇視的對峙再加之利益上根本相反遂引起不斷的衝突了，這就是階級戰爭。

然而社會不是靜止的，牠變遷而且進化，所以這資本主義時代在相當期內將漸次變化而爲別的時代所替代。資本主義的將來發展一定趨於這種形式：一方面資本

集中更集中，最後歸到極少數資本家的手裏；一方面無產階級的組織一天比一天嚴密和精到。這進化到了極點的時候，無產階級遂起而推翻資本階級，取得他們的生產工具，正與資本家從前推翻那操有特權的貴族階級一樣。

依着這學說，凡政治事實都是經濟變動的反映，因為社會組織的變遷，無產階級將來一定會勝利，階級的區分將來也一定會消滅。

這學說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實在不可忽視；使馬克斯得到社會主義創始者的名號，這力量比他的價值論的還要大些。牠吸引人的祕訣，就是：牠担保工人階級定在得勝的方面。未來歷史的進展是依着社會進化之不變的原則的，政治的變遷只是隨着經濟的變遷，所以在相當時期中，資本階級一定會消除的。然而階級戰爭和無產階級的興起究竟在什麼時候？這些事實都是不可避免的嗎？進化是否必需劇變才能進行嗎？我們是否可以信任自然的進化能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社會改革嗎？

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同，遂使社會主義分爲進化的與革命的兩派。第一派注重馬克斯的著作之生物學方面，在大不列顛很佔勢力的。社會既是進化的產品，牠就是一種有機體，一種生命的構造，可以生長或死亡，正如別的生物一樣。生長與死亡是緩緩的進行的；可以用人類智慧去探究牠們，也可以因人類努力而促進牠們，但不能反乎牠們的本性或使牠們停滯，也不能用劇烈的改變使牠們加快。

進步是包涵在許多連續的改造中，這些改造使漸進的社會達到新的變化；所以一種變化是由許多改造之總積而成，而不是構造上之突然變換。這種進化的社會主義派，也稱作集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本章下面就要討論牠的理論。

但是另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斯的學說，又有不同的解釋。不論將來情形怎樣，他們注重這事實，就是：現在的社會是兩個相反的階級所組成的，即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他們的利益是絕不相同的。他們的中間有一道深溝，這深溝只有使社會發生全部變動的革命才能搭過。誠然，社會在自然之途上變化而且

進步，但同時這些被剝削的工人生活在痛苦中，他們却不能夠等候了。任何步驟只要能使經濟和政治的構造起全部的變化，他們都要採取以加速社會的新變化之實現；在這種爭鬥中，戰鬥的工人階級應用暴力以完成沒收資本家財產之工作。

這樣的對馬克斯的解釋爲共產主義或一部份工團主義所採用爲其理論之基點，這將在後章去討論。

B 對個人主義的反動 馬克斯學說所引起的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之不滿，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更有別種力量從而促進之。這些力量是從政治學說的一種新概念中產生的，認國家爲一種有機體，受生長與死亡的公例所支配，這概念是爲進化論的馬克斯派所採取的。我們在前面已看過，從一八七〇年起個人主義遂漸漸衰落下去，至一八八九年費邊派的論文集 (*Fabian Essays*) 第一次刊行，十九世紀式的自由主義總算受了死刑的宣告了。

自由主義所遭受的批評，在前面個人主義一章裏已經說過，現在不用在此重述

了。個人主義之失敗，主要的是在經濟方面。當一個人除了賣他的勞力給出價最高的人之外別無他法，若告訴他他應該選擇於他自己有益的事，這簡直沒有用處；當一個人在忍受饑餓中，不得已去接受那一種半飽的工資以為救濟，而對他說他享有自由條約的利益，可以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怕國家的干涉。這樣豈能使人滿意？長時間的工作，低廉的工資，生命被踐踏，發展被限制——這種種的不幸，是為工廠法（Factory Acts）和工會法（Trade Board Acts）所要減除的——均足以表示出供求律之無限制的應用，對於社會的健康和幸福是何等的危險呵。假若能使多數人民能得到維持生活以上的工資，那末，社會方面就不要再像從前一樣，應該多多的干涉和管理工業，以便使他們免除自由競爭的罪害，——這在事實上漸趨明顯了。

至少在這方面，政治如人身一樣，假若聽任何部份無限制的放縱牠的欲望，結果，對於這有機體的他部份定發生不好的反響；若一個特權階級能自由的追逐他們

的私利，這定有害於全體幸福的。

在任何社會中，政治組織是必須的，因為公共行動必須糾正那種混亂，這混亂是人們的自主行爲所引起，而這行爲却又能影響他人的（一）。

（下）原註：見林德賽的國家論中(A. D. Lindsay: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自由主義所鼓起的經濟上的行動可以說是盲目的，其原因是：雖然這行動由於許多個人意志所造成，而其結果却沒有一個「願意的」個人希望如此。這種經濟上的行動之最顯的例證，就是當謠傳某銀行要倒閉時所引起的儲蓄人之行爲了。

每個儲蓄者爭着取回他的儲金，這些行動是各個人所自願的，然而行動的結果却非任何人所希望的，這就是說：沒有一人希望這銀行的倒閉。

爲防止從這種盲目的和無限制的經濟行動所生的罪害，國家的干涉是必要的了；因此，個人主義之第一個和最重要的反動，就是力持防止那種無限制的自利的結果，爲必要的國家行動。



第二個反動，就是對於財主獨享那由僱主與工人共同努力所獲得的利益之權，漸漸發生疑問的傾向。雖然不是整個的接受馬克斯的交換價值說，但也反對資本家僅因他佔有生產工具遂享有全部利益的特權，甚至於進一步懷疑資本家的必要了。費邊會（Fabian Society）的初期宣傳即根於這些理論而來的。

費邊派并不攻擊資本爲資本家從工人方面偷來的勞力之值。而且正相反，他們承認：即在馬克斯自己的立論上，資本家對於社會進化也曾有過相當的，必要的貢獻。在工業革命的初期，資本家於工業組織——如創辦管理等——上實做了不可少的職務。因此他得以享受他和工人共同努力所創造的交換價值之一部份，縱然他無權享受這價值的全部；即如現在的工業管理漸漸的交與僱用的管理員了，而他也不能毫不享受利益的。

除了馬克斯所說的交換價值大半是由手術工人所造成的之外，還有一些價值是社會全體所創造的，這些價值不應該當作個人的私利，而應當歸諸創造牠們的社會

之公益。

費邊派看見因為社會需要土地，才造成土地的價值，於是他們提議，土地的「不勞而獲的增值」(Unearned increment)應該不歸諸地主而歸諸社會全體；并且對於社會所創造的一切價值都有同樣的提議。

費邊派不認個人為獨立的單位，他能以自造利益而不需別人的幫助，他們却確信社會如一「生活體」(A Living Body)的概念，社會的一切需要與活動是和創造財富的個人相合一的，無論在什麼時候。所以城市的擴張，增加土地的價值；而煤礦的發見，或鐵路的延長，也都能發生同樣的效果。同樣的，社會需要一個大墾荒家，因為他有較好的胆識，本領，和工具，所以社會遂出付地租。但是假若社會不需要他的事業，這墾荒家也就無用了，正如社會不需要在某地上建築房屋而這土地也就失去了價值一樣。在任何情形之下，價值的創造社會總有一部分功勞；而且在任何情形之下，出付這地租的也是社會。

這種以社會當作價值的創造者之有機體觀，隱示着一種明顯的結論，那就是社會所創造的價值，社會就應當管理與享受。從這點再進一步，社會全體即應當擁有生產的工具，並且社會對於公共事業，如鐵道，礦山，公路，運河等即應當操有與管理了。因此，這些生產工具與公共事業是要用來為全體謀福利而不是榨取全體以增加少數人的富足，社會也應當享受牠自身所創造的價值。

但是顯然的，社會自身不能担負這些紛煩的工作；牠定要有表現牠的意志之一代表機關，這機關依牠的指導而工作，并為牠的利益而管理一切公有的價值。集產主義派認為這機關可以在國家（一）中找着的。集產主義者的理想，是要使社會全體有一個民主國家之代表機關，這機關為一班老練的治事家所管治，他們能以社會的財源為社會謀最大的幸福。事實上國家本身就是工作者。所以將來僅有國家所僱用的工人在他們自己的指揮之下而工作；僅是那些有生產工具的人才能為工具的享用者。

(一) 原註：此處所稱國家，是泛指合組的社，而省，或區，或縣，或城市，或府，或一民族，或如集產主義者所說的消費合作社。

對個人主義的反動將我們帶得如此之遠，這一點是值得驚異的。現在不但以國家是一個障礙物，使牠對於私人企業和自由競爭之事務的干涉減少到最小限度；我們反被引到認國家為社會進步的必要因子，僅靠牠的機關之干涉，工人才能解除資本家所加諸他的壓制，才能達到享受剩餘價值的地位，這種剩餘價值，從前都是被特權階級所剝奪了的。

現在我們要敘述兩方面：一是社會主義的哲學，一是社會主義者為給這哲學之具體表現而提出的各種辦法。

## 二 社會主義的哲學

個人主義者常說：社會主義定會造成使個人附屬於國家并剝奪他的自由的結果。雖然有幾種社會主義在實行上得到這種結果是可能的，但是社會主義的目的

恰與此相反。社會主義是想爲個人解除物質上的壓迫，使他可以依着自己的志願而生活和自由的發展他的人格。因爲社會主義者抱着國家是一有機體的觀念，如許多互相倚賴的份子所組成的個體，所以他相信自由只能從很好的社會組織中而完成。

社會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的目的根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各個的目的都在給個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不過個人主義者想着要得到這種結果，最好是於人與人的交涉上極端減少外界的干涉與限制，而社會主義者却主張必須人們在社會中合作，互相給與實現一種完美自由生活的可能，這種自由才能得到。

個人主義者僅能贊美個性，而對現在的制度個性因物質勢力的壓迫而遭打擊；却不反對，社會主義者提倡爲社會和國家而工作，他們所以如此主張，就因爲個人必須賴着社會才能得到較大的發展和自由，而在孤獨中是不能實現的。事實上社會主義使社會組織比諸個人主義的更爲緊密，並不是爲着社會的本身，而是因爲牠

以爲每個人必須能自由的從事精神活動，真的個人主義才能達到。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過，個人主義的學說是接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一種半科學的例證。假使生存根本上即是一種爭鬥，惟有適者才能生存，那末，人與人間的自由競爭就是社會惟一的基礎了。個人主義者既斷定人性是被生存競爭所支配的，故他認爲文化的目的即在使這競爭的組織趨於適合那最多數都能生存之一途。這就是說，他只想到生活的量的方面。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者相信生活可以超出於生存競爭，并認文化即爲超出這競爭的工具。生活是有種種不同的，不僅在生命的繼續；生活的質的方面比量的方面更爲重要，文化的職務就在解除個人生存競爭的痛苦，使他能得到最高的質的生活。

我們所說的「質的生活」，全靠我們所想的各種有價值的事情上，這就是說：全靠着我們的哲學。我們假定好的生活至少是部份的要能以發展精神價值，能以從事善的精神活動。爲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做那美的事情只因爲牠們美，

做那善的事情只因爲牠們善——所有這些再加上生理的與心理的磨鍊，趣味的高尚和態度的文雅都是好的生活的原素了。不過這些條件必賴乎安閒，知識，和相當的經濟才得達到。這就是說：必須人們超出僅爲生存而爭鬥，這些條件才能完成；集產主義者之崇拜國家的祕訣，就因爲他相信僅以國家爲工具才可以超出這種爭鬥。卜勞克（Mr. Clutton Brock）將這意見說得很明白：「國家并不是爲本身勢力而存在，也不是爲求牠的全部或一部份子的生存，而是要牠的份子可以做那些值得做的事情的。」「每個國家的目的都在達到某種合作的程度，國家所以能存在，就因爲人們在這種合作中能忘却自己。因此政治上最後的問題發生了。他們應當怎樣合作呢？社會主義者不配稱作一個合理的徹底的社會主義者，除非他能給這問題一個正當的回答，那就是，他們應當合作，從合作中來盡量的免除生存競爭，而去做那些本身有價值的事情。」

因爲社會主義派的國家觀之根本信條，就是社會是人類的一種組合，牠的目的

即在給與全部份子滿足他們的精神自由與善良生活的欲望之機會。

社會主義者這樣去看社會，自然希望人類爲牠而工作。一旦資本家被打倒，工人就是國家了。他們將覺得爲社會而工作就是爲他們自己而工作；他們承認國家的規律，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所服從的規律內藏着維持公共幸福的一種欲望；他們將有更好的工作而且工作得更愉快，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工作的收穫不是增漲一個私人僱主的利益，而是使全體人類得到更圓滿，更富足，更自由的生活。

社會主義就是想以公益的動機去代替私利的動機。社會主義者認爲當工人本身就是社會的時候，因爲有餘暇和相當的經濟，較諸現在，僅爲免除飢餓不得不以勞力供資本家的榨取，而爲社會工作必定能作得更好以達到善良的生活之境地。假若社會主義這種假定是錯的，假若人類的本性只爲他們自己而工作不願意爲社會而工作，那末，社會主義的樞關就全部坍塌了。因爲這理論是社會主義的基礎。人類不是有前面所說的那種社會精神，即是沒有或不能有那種社會精神的。對於



這種心理的假定，我們在最後一章將再為討論，因為這是各種社會主義所共含有的一點。

### 三 集產主義的主張與政策

第十一版的大英百科全書裏曾說，社會主義就是「那種政策或學說，牠的目的是在以民主的中央集權之行動去達到比現在較好的財富的分配和生產。」這定義很適於集產主義的目的與政策的，除去一個重要的例外，牠還足以證明各派社會主義者的許多目的。這例外我們在後面再討論。現在我們只想將社會主義派所提出的關於（一）財富的較好分配，和（二）社會的公共生活歸社會管理之各種辦法加以說明。下面這幾條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是任何社會主義派所贊成的。

（一）生產工具私有制的取消，牠的目的，要將重要的實業與事務歸諸公有與公管。

（二）實業的目的是在應社會的需要，而不是為個人利益的；因此，生產的範

圍與性質是依社會需要的原因而定，不是依利益的預計而定。

(三) 要以現在被資本化的實業所阻害的公益動機去替換私利動機。

上面所舉出的三個條件是各派社會主義者一致承認的，而他們所爭持實現這些條件的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在本章的後段就要敘述集產主義派的政策了，他們是屬於進化派的。但是我們應該記住：次兩章將論到的社會主義的各派別於我們現在所述的各種主張之外，很少新的加入，無論關於方法上或目的上的。

為欲完成前面三條件所涵的社會改革，集產主義派所採用的方法是極合法式的，他們認為促進這改革的機關就是現存的國家，國家可以受輿論逐漸改變的影響，這改變由於社會主義者加緊的宣傳所造成，并經過選舉而實現的。不能由現在制度有一突進的改變遂達到社會主義的統治。集產主義派相信社會的生物觀——即認社會如一有機體——所以他們堅持社會只能逐漸改革的，每一改革都是受前一步社會組織的情形所限域。由這一點觀察，以現在為起點，即可根據現在以推定

將來進步的方向與速度了。費邊派可以說爲集產主義者做了鋪路的先鋒，他們將他們的理想參透在文官職務（Civil Service）中，極力提倡國家不斷的干涉經濟事務的政策——這政策在工會法，健康和失業的保險法（The Health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年老恤金法（The old Age Pension Act.），地方政府權力的擴張，和別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辦法中得着結果了。——并極力擴大宣傳以求社會主義的主張影響輿論。

集產主義派不但認國家的議會機關爲促成所希望的逐漸改革之工具，并且當改革完成了，他們還要牠去管理他們所希求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生活。政府一面是促成改革的機器，一面因文官職務的促進和漸趨於民主之路，所以當改革實現了，牠又成爲管理事務的機器。

然而問題馬上發生了，所謂政府僅指中央政府麼？國家僅指議會麼？集產主義派不贊成這種概念，因爲通常總拿過分的中央集權來反對他們，所以最好注重

這事實，就是早年的費邊派社會主義也以擴張地方政府之活動範圍為重要的事。

在一八八九年伯納蕭（Bernard Shaw）即說過：「一個民主國家不能變為一個社會的民主國家，除非牠在每個人口集中的地方有一個地方政府，在組織上極端的民主化如中央會議一樣。」近幾年來，因受基爾特社會主義派和別方面——關於這點我們在下一章要提到的——批評之影響，英國社會主義的思潮漸趨於增加地方政府管理職務的傾向，這些職務在從前為一種中央集權的文官職務所必要的。英國工黨（British Labour Party.）在一九一九年曾刊印一篇論文，叫做勞動與新社會（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的，是現代進化的社會主義派的要求之最好的說明，他們極力主張戰後的各種社會改造應該儘可能的限度內交給「民主的地方自治團體。」中央政府是站在指導與幫助地方政府的地位，前者只要注意後者是否能保持至少限度的效率，而後者却應給以「自由去發展中央政府所保留的以外之職務，無論他們採用什麼方法。」這些職務包括，氣，電，房屋和

地方交通的管理外，還包括教育，衛生和警政的設備，及圖書館，公園，公共娛樂機關的建設，煤的零售與牛乳的分配。地方政府所管理的事務，不僅是關於人民身體衛生方面的，並且及於精神方面使他們配做良好的公民。無論如何，關於政治管理方面，我們很難加集產主義以過分的中央集權之罪名，這一點是通常反對牠的藉口。

上面所引到的英國工黨之主張是很能動人的，在這裏面也明白的指出了集產主義的傾向，牠所希望的目的和牠追求這些目的的態度，我們要把那些最重要的方面條舉出來，以作現代社會主義思潮之代表的說明。

那些主張可以當作目的本身，也可以當作達到他種目的之方法；這就是說，他們一面在現存國家中是需要的本體，一而又是造成一種新的和較好的國家之工具。

工黨相信將來的社會不是基於爭鬥，而是基於親愛，不是基於僅為生活而競

爭，而是基於爲全體份子——無論他是用腕力或腦力的——謀福利之生產與分配的  
合作，因此他們提出下列的四種主張來：

(一) 規定一致的最低限度工資；

(二) 工業管理的民主化；

(三) 國家財政的改革；

(四) 以剩餘財富謀公共的福利。

第一個主張是基於這種信心，就是國家對於個人應保障他收入的工資，足以供  
充分發展他的知識，身體，與性格的需要。因爲這種目的，所以工廠法還應加緊  
與擴張，每星期的工作最多不能過四十八小時，并確定同等工作同等工資之原則。

國家防止失業的責任也被重視，爲維持這目的，所以主張強制教育的年齡提高  
到十六歲。無論爲什麼原因而發生失業，工聯對於失業的工人應該以公費維持他  
們充分的生活。

第二個主張在下章還要詳細討論的。現在可以注意的是：這主張包括鐵路，鑛山，電氣，運河都直歸國有，如通常社會主義所規定；主張漸漸的消滅資本家，對於股份公司加以相當的課稅；并強制沒收各種謀利的實業保險公司，由國家辦理人壽保險之全部事務。

對於教育也有幾種提議，要使國家的每個份子——不問他的社會地位如何——得到同等的機會去發展他的智力與實現他一切的天賦。他們力爭教育與知識不是少數人的獨佔品，應該變為每個公民的遺產，這遺產不問他的父母經濟如何，他都能自由享受的。

這論文（指勞動與新社會）於是進而論到行政的問題了。工黨很便易趨於過分的中央集權的。所以接着下面就有增加地方政府的活動與職務之規定——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了——并提議在蘇格蘭，威爾斯，英格蘭各組織議會與在勿斯提密 尼斯特（Westminster）的議會平行，以完成聯邦議會的職務。

同樣的，關於工業管理的民主化，我們也可看到許多詳細的提議，這提議與工業國有的要求并行着。論文這一段是深受着次章所說的社會主義學說之發展的影響了。

第三個主張是討論實施這各種計畫之經濟來源的問題。顯然的，最低標準的生活決不應當侵害的；即於教士和小的中產階級也不應該奪其收入。所以他們提議的是：所得稅與富人稅（Income and Super Taxes）應當澈底的改革，使其漸趨於所有納稅者的實在負擔幾於同等之一途。這於現行的所得稅有極大的變更，結果，在最低的納稅階級每磅只付一辨士（penny），而在百萬的富豪每磅却要付十九先令（shilling）了。

跟着這主張而來的就有徵收資本稅（Capital Levy）的計畫，對於每年收入超出千磅的人都實行徵收資本稅，國家戰時債務因此將可以償清大半了。

這些主張是表明工黨對於剩餘價值說的承認。經國家所贊助的計畫與特准之



規定，將剩餘價值都間接的轉到創造牠的人們手中去了，結果使私人享有剩餘價值的事實不能存在。——這是將書生理論應用的一種奇妙的英國方法。

第四個主張實在已包涵在第三個主張中。牠說明鑛山的財富，勞動以外之土地的租價，和科學發明的物質結果都是剩餘財富；并指出這剩餘財富在從前盡變作不勞而獲的階級之奢侈品，因此提議將牠沒收，用之以謀公共的福利。

重要事業的國家化或地方化，遂將這剩餘的財富由私人手中轉到公庫裏了；即使某種工業仍暫歸資本家管理，這依等級增加極陡的所得稅也使國家享受不少的利益。國家有了這大宗的財富，可以用之設備國家的教育，維持一種很高的最小限度的工資，用之贍養病人和廢疾者，用之供給產婦，用之鼓勵科學的探求和提高社會生活的標準。

這些主張使一種政府參透了社會主義的理想，這是可以看出的；事實上，如其說牠們是方法，不如說是目的，這目的僅在一種社會主義的國家才能完全實現的。

問題自然發生了，「這種國家究竟何似？牠的構造如何？牠的政府形式又如

何？」韋卜夫婦（Mr. and Mrs. Sidney Webb）在他們的社會主義大英共和國之憲

法（*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一書

裏，曾竭力的回答過這些問題。現在我們不能把他們的主張摘要的述出來，一半是限於篇幅，一半是因為那些主張在政治上在實業上都引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關係，與消費者和生產者權力之範圍的極大爭議，這些問題留在次章討論更為適當些。若有人想知道現代社會主義的英國派之代表人物所主張的政府方式，希望他去讀這一部精深宏富的著作。



## 第四章 工團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

### 引言

我們在前而引用第十一版英百科全書之社會主義的定義時，即說除去一個重要的例外，牠可以說明現代各派社會主義的目的。這個例外就是本章所要討論的。那定義會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學說，牠的目的是用民主的中央集權之行動去得到一種較好的財富分配，這是應該記住的。假如這一「民主的中央集權」是指現存的國家，許多社會主義者一定反對道，從這種民主的中央集權是不能達到一種較好的財富分配的，或是認為牠不能造成那種基礎，以建設將來社會主義的社會。

二十世紀的初年顯見對於國家及理想派的政治學說生出一種不滿，這學說是跟着黑格耳而起的，帶着神祕的理想認國家為絕對的自完體，在任何社會中，牠都要

行使主權的職務。恰與這觀念相反的就是另一種學說，牠認國家爲消費者的組織，不過是個人所屬的許多組織中之一個，政府這機器會被別種機器所擠掉和代替的，假設後者更合于社會的需要。所謂「公意」即可當作一種假設之神話，或被認爲是許多不同的意志，這各個不同的意志需要不同的代表機關去表示的。

大戰中，國家管理權的擴張不但未消除對於國家的不滿，反使這不滿增加了，甚至于集產主義也被這種對於中央集權政府的普遍仇視而有很大的改變，這是我們在前而已經看過的。

在攻擊集產主義的國家之戰鬥中，工團主義派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是站在領導的地位的。

工團主義在這兩種主義中是發生較早的，牠的反對國家之力量恰可以與集產主義派爲國家鼓吹的力量相當。現在我們先來討論牠。然這并不須我們多費時間，因爲工團主義中之有價值的主張大半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所參進去的，牠的理

論是從社會主義之最近發展中抽選出來的。

### 一，工團主義

工團主義一名詞，可以用于一派社會學說或社會組織的理論，也可以用于一種行動的計劃。這行動的計劃就是馬克斯所說的階級鬥爭，牠的目的是在造成一種工團組織的社會。雖然工團主義者之行動的計劃很直接，乾脆，和明顯，然而牠想實現的社會頗為模糊的。大綱是有的，不過很紛亂，至於詳細的計劃則付缺如了。這種模糊有時很巧妙的，牠有牠的一種原因，這是當我們在後面討論到影響工團主義領袖之特種哲學時，我們可以看出的。

我們現在先敘述工團主義派之社會組織的理論，次則討論他們所主張的行動的計劃，再次則研究工團主義之基本的哲學了。

A 工團主義的社會觀 工團主義可以說就是那種社會學說，牠認工聯組織為新社會的基礎，并為造成新社會的工具。這很明顯的是帶着社會主義性的，牠和

通常的社會主義者一樣，認資本爲贓物，擴大階級爭鬥的觀念認其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根本辦法，并主張取消生產工具的私有制而代以社會公有。

工團主義一面反對集產主義一面也反對共產主義，牠的精髓是從普魯東 (Proudhon) 的著作中抽出來的而不是從馬克斯的。普魯東的聯立共產主義 (Associative Communism) 的社會觀，有許多點是和無政府主義派所主張的自由社會的組織相同 (見本書第五章)。法國工聯主義 (French Trade Unionism) 受普魯東的學說之影響頗大，結果發生一種地方的和反集權的傾向。這傾向尤其表現在那種性質中，牠認工聯爲將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國家之自由社會的單位；從法國工聯主義所產生的工團主義，始終未失掉無政府主義的同情，後者是前者之源流呵。

工團主義和集產主義之最大的不同就在前者堅持生產者管理全社會的重要。

在工團主義派看來，工人既是創造價值的人，他們就應該是社會管理者；這就是說，工團主義派認爲工人是生產者，他們不僅應該管理經濟或實業方面的事務，并應

該管理政治方面的事務，再說正確一點，國家（即政治方面的機關）不必存在，牠的職務應該交諸生產者基于職業所組織的團體去行使。在這一點上，工團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不同了，因為後者雖然和前者一樣的反對國家干涉實業方面事務，主張完全的把牠交諸生產者自管，但牠却認為在政治方面尚需一種代表公意的機關，在這一點上，基爾特社會主義恰折中于集產主義與工團主義之間了。

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來，工團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動，因為後者認社會僅是消費者的組織，所以前者就趨於別一極端，只堅持生產者的重要了。一位工團主義派的領袖伯勞提厄（Pelouzier）曾說過：「革命的工作不僅要使人類從一切威權下得到解放，並要使他們從一切不以發展生產為目的之制度下得到解放。」

工團主義派之反對國家論——即反對社會上任何形式的國家組織，可以簡單的說明如下。



第一他們有一種籠統而又模糊不定的仇視國家的情感，認牠是一種中產階級的制度。國業不僅在今日之社會中是資本主義榨取的工具，而從牠的本質上看，即在將來的社會牠也定是中產階級的工具。國家的行爲使人官僚化，并且對於從事實際生產工作的人之需要與欲望無同情，這種情形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繼續下去的，假若那社會還留國家存在。一種中央集權的組織趨於單調，腐化，缺乏想像力與創造力，和不信任地方的發展與企業。縱然一個很好的國家，假若讓牠去管理實業，也一定是阻害進步的。假使國家在實業方面得到這種結果，牠在別方面也是一樣。知道手工工人需要什麼東西的不是這中產階級的「公僕」(CIVIL SERVANTS)，而是手工工人自己，因此，在實業組織上，牠就應該歸諸手工人去指揮了。

因爲厭惡中產階級的國家，遂引起不信任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者自誇在社會主義中僅他這一派是工人的產物；其他的社會主義都是聰明的中產階級理論家臆造的，并且是忠于牠們的始祖的。這些社會主義都表現出一種傾向來，

就是使工人與既存的社會制度相妥協，因為這制度於知識份子是很相宜的。牠們不能合乎工人的需要，這些需要只有在工人所發明的制度之下才能適當的表示出來。爲保持階級意識的緊張，最重要的是不使工人與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相近，而且後者是革命的障礙物應該打倒的。

他們力言生產者管理的制度，定可以增加工人的自由與實業的效率。在實業爲工聯所有并管理之下，每個參加工作的工人對於管理上都有直接發言權了。因此，他能在每次工人生活的立法中享受民主主義的實在利益，較諸在那種錯誤的政治制度之下，每隔幾年叫他去投票一次以選舉他自己不願選的，毫不能稱職的，在國會中不能代表他的三四議員，真有天淵之別了。因爲實業的管理與他有切身的關係，他一定很高興工作，牠的出品在質與量的兩方面也一定會有進步的。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在工團主義的統治下，關於整個社會的形式應如何假定，並沒有詳細的告訴我們；而且對於國家生活的經濟方面如何組織的問題，更有

各種不同的計劃。這些不同的計劃之詳細辦法隨着各種運動的形式而差異，各種運動即是計劃所從出的地方，這是應該明了的。最足以代表工團主義思潮之學說，是發源於法國；爲使讀者易于他們明了所主張的將來社會之組織起見，必得先將現在法國工聯的組織作一簡要的敘述。

使工團主義民衆化之最有力的團體就是法國勞働總同盟。(French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以下即簡稱 O. G. F. ) 這同盟是由兩種團體組成的。一方面牠包括七百多個工團，即從事同業或同職的工人之工聯。這些工團正式成立于一八八四年，加入 O. G. F. 是在一八九五年。與工團相并行的，法國工人還另有一種組織。這組織就是工人協會 (Bourses du Travail)。一個工人協會包涵各種職業的工人，只要他們是住在一地方的。牠的職務在爲牠的份子謀一地方之勞働交換并保護該地方的勞働之利益。一八九三年由這些協會組成一個工人協會聯合會 (Federation des Bourses du Travail)。這聯合會在一九〇二年又合併到 O.

Q. F. 中，結果遂使地方工團形成雙重組織了；一方面與同業的別個工團的工人在一起，代表該業的利益和需要；又一方面與同地方的別個工團的工人在一起，即參加在工人協會中，代表該地方的利益和需要。這樣組織大部份是上面說過的伯勞提厄所想出的，採用牠爲工團主義的一種政策，也大半由於他的影響。

最近法國工團主義者所提示的社會組織顯然是摹倣 Q. F. 的。所有地方工團均加入到一個協會中，這協會一面是該地方的僱用機關，一面又是工聯活動的中心點。這協會既與地方的經濟需要有密切關係，那末，爲供給這些需要，牠就要與鄰近的協會合作了。這就是說，牠不但決定該地方的實業生產之性質與範圍，並因爲與別地方的協會合作，更決定這些地方的物產之輸入和輸出。

這種極端的地方組織制度，是法國地方工業制度的反映，也是一般工團主義之代表的說明。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工團主義深受了普魯東學說的影響，以工人協會爲社會組織的基礎，那無疑的是受了他的地方單位制度之暗示了。這種制度

當然不適用於那些實業大規模組織的國家如大不列顛等。或者因為認清了這事實，和認清了依消費者的觀點規定的需要（這需要為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所重視。

他們的理論頗影響于工團主義的後期發展。）所以使一九一九年在里昂開的工團主義代表大會有這樣的要求：「現代經濟方面的大事業應該『國家化』如：水陸運輸，鑛山，水力，及信用組織等，」并說明「國家化」是以國家財產交付與利益攸關的兩方面，即生產者與消費者。

雖然工團主義後來有這些發展，但是牠的最顯著的形式還是趨向于社會組織應以極小的實業單位為基礎；美國工團主義的團體之世界產業工人宣言曾指明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是同出一源的。

B工團主義的方法。因為工團主義派偏激的反對國家如前面所說，所以他們也就不相信政治方法可以做那完成他們所希望的社會改革之工具。眼見工人階級的領袖才選到國會裏去，遂漸漸的失去了革命的精神，採用中產階級的和平改革政

策，在法國尤其常常如此，因為這種經驗，結果他們相信工人只有靠他們自己了。國會裏工人議員不是代表他的工聯的，而是代表他的選民，因為這原因，所以他決不能盡力於工人的利益，即使他很願意。工人在國家中應該由他的工聯直接取得權勢，而不能間接的從國會中議員們得來。因為工團主義派主張無論何時在經濟方面都採用一種「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政策，所以他很便易被解作暴烈行動。

工團主義起于這種假定，即認經濟勢力為達到新地位的鎖鑰。這觀念所以能構成一種原則者，馬克斯創于始，更因策略的研究而增加生力了。工人有不同的政見，但他們却有相同的經濟利益；所以他們在經濟方面浸潤在聯立的意識中，這為政治方面所缺少的；他們雖不在一起投票，但是他們在一起罷工。無論如何，一個政黨不能算好的革命工具；牠是分散的，牠很少接觸的，牠太鬆大了，不能使公意得到直接的表示。

因爲這種理由，所以工團主義者趨于集中經濟方面，在這方面，他們重要的武器是罷工。罷工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他們所鼓勵的，爲增加工資而罷工，爲減少時間而罷工，尤其是爲爭取管理權而罷工。罷工本身就是好的，也是達到本身以外的目的之工具。罷工本身是好的，就因爲縱然他失敗了，牠還可以給與工人一種聯立的意識，一種經驗的教訓，和一種自助的情感，同時更可以緊張階級爭鬥，并將國民劃成兩個仇視的部份，即一面是無產階級，一面是資本階級。罷工是好工具，就因爲牠能漸漸趨近總罷工的一日呵。

以總罷工爲實現革命的武器，這學說一半是從法國社會主義學者卜蘭格（Berger）而來的。總罷工也并不是全體工人的罷工。我們還不敢希望有相當數目的工人能被十足的階級意識所鼓動，去爲完結資本主義的制度而罷工。我們所要的只是那實業樞紐之一部份的工人罷工，使資本主義停滯。因爲現代實業漸趨繁複與互賴，所以使這種總罷工很易于實現并發生大影響，更可以使少數工人能停頓

全體實業。只要具有相當勢力之少數有階級意識的工人能做到一種持久的爭鬥，總罷工就會實現了，生產工具就奪得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末日。

這種性質的總罷工是非民主的，牠也許和多數工人的意欲相反，然而這情形并不重要。多數專政的成見被斥為中產階級之一種護符，而且他們認為：在過渡期間少數人攬得權力以領導其餘的工人去達到自救之路，實為必要的事。

在這一點，工團主義派與嚴格的馬克斯學說分離了，或者無論如何也是馬克斯學說的一種新解釋。他們認為馬克斯宣稱資本主義的社會在相當期內一定會進化到那一階級，那時候無產階級定會起來打倒資本家的；實未免過于樂觀了。僱主並不願意為他們的階級而爭鬥如馬克斯所假設的一樣；他們用種種方法調和，讓步，化除工人與僱主的界限；直至工人的革命精神趨于消滅。在這些情境中，無論如何工人應該盡他們的力量採用一種長期的抵禦政策。罷工固然是他們極有力的武器，也還有許多別種妨害作業（Sabotage）的方法，如：怠工，破壞機器，損



壞物品和故意曲解規則的條文以阻礙業務之進行。或用抵貨方法或在商品上標明工聯的字樣以說明該商品係合乎工聯條件的。更有一種（Cacandy）的方法，即格外過細使出產物的量數減少。

這些方法都可以用的，一面因為牠們的直接效力，一面也因為由此很易于走到總罷工的路上去。雖然有幾種妨害作業和Cacandy是一部份工團主義派的領袖所反對，認為有傷道德的。

C. 梭銳耳（WONN）的哲學。總罷工是個很含混的名詞，這是沒有疑問的；不過這種含混很巧妙，正如工團主義者拒絕把將來社會之確定圖像描畫出來是一樣的。這種含混與拒絕，或一半由于法國學者梭銳耳的影響。梭銳耳的著作是政治和哲學之一種奇異的結合，是將玄學的理論應用到社會問題上去了。因梭銳耳的著作，遂激起了柏格森的直覺論（Bertrons Theoros of Intuition），一般工團主義者實不能了解此理論而他所視為正當的行動，都是柏格森所要首先反對

的。

柏格森的哲學在十九世紀的後十年和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很盛行於法國，牠認為我們的行爲的目的不是爲理性所支配，而是爲直覺所支配的。理智只能告訴我們去做我們所要做的事，但是牠不能指定什麼事是我們所要做做的。而直覺不僅決定我們行爲的目的，即我們能以了解宇宙的性質與意義，也都由於直覺。直覺給與我們的概念雖然很清楚，但是很難向一個沒有這直覺的人用具體的，理性的名詞將牠解釋出來。直覺是純粹的個人行爲，是無理性的如忠心一樣，但牠可以迫促人們去行動，如一種宗教信仰（一）。

（一）原註：關於柏格森直覺論的詳細說明，請看本書作者所著的現代哲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ilosophy）柏格森章。

就是這說明我們的形而上學的直覺論，梭銳耳用來證明那種不可以理性形容的總罷工。在梭銳耳之意，對於工人不必詳細的說明總罷工的目的，也不必說明要

造成怎樣的社會。他們理解中的社會——即他們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直覺的；這就是說，牠不能爲理性教條所支配，也不能成一種如理性所指示的形式。用梭銳的話，總罷工對於工人是一個「神祕」(Mystic)，這神祕的觀念可以給人們充分的熱情，正如早年的基督教徒熱烈的希望基督復活一樣。要想將這「神祕」理性化，結果一定趨于錯誤。這樣去估量總罷工的價值或目的，「所有通行于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或其他喜歡研究政治學的人之間的一切研究的方法都應該拋開了」。這學說的優點之一就是，使人對於這種概念無法攻擊，梭銳不僅是不承認他人對於總罷工的批評，並且不承認任何討論。在政治的論戰上很難找着更好的武器了。總罷工既然如此，其他較狹的罷工亦莫不如此。因爲罷工的動機是深藏在我們本性的直覺中，「零星的罷工可以使無產階級把他們的高貴的，深的，活躍的情感放射出來；總罷工可以將他們聯在一起，使他們站在一個同等地位，給他們各人以最緊張的情感。……我們所得到的社會主義的直覺，是不能用語言說得很清

楚的，——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籠統的概念。」

我們不要太重視這學說在工團主義運動中所生的影響，這是很重要的，——這重要并不是別的理由，就因為許多學者過于重視牠了。通常的工人并不是一位柏格森的信徒，他也不曾聽過什麼「直覺」。即梭銳耳在工團主義派領袖中有什麼大影響，也還是疑問。先有工團主義，後有這位不必要的辯解者——梭銳耳。在某方面看來，工團主義發展的結果恰與梭銳耳的教條相反了。舉例來說，梭銳耳和一般理論家均反對妨害作業；他們認為怠工行為足以使工人不能革命。但同時，梭銳耳的學說給急進政策——如「總暴裂」(blowing up)只為着要「總暴裂」的主張——一個半理性的辯護，這種辯護，恰與工團主義的宣傳之急進性相合了。梭銳耳意見的要點，就在他辯護罷工以外無目的，也不必有目的。梭銳耳曾指出破壞不一定就是失望，工團主義遂執着這樣一個方便的理論了。工團主義的宣傳在歐戰前的法國與美國都很盛行；但我們應該記住的有兩點：(一)大戰以後牠就很少

進展，（二）在英國從來很少有人贊成牠。在一種本性喜歡讓步的民族中，工團主義實在太學者氣，太極端，太理論了；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思潮——這是從國家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裏生出來的——在英國比工團主義佔勢得多，或至少有這種趨向。這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

## 二·基爾特社會主義。

我們討論基爾特社會主義，最好分作三部份。我們先看一看牠的前身，次則敘述牠根據的一般理論及牠所希求的目的，最後則對於牠所主張用以達到這些目的方法略加估論。

A.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前身。我們不必詳細的敘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歷史了。牠是一種純粹的英國學說，最初引起人注意的就是由於彭提（A. T. Penty）在一九〇六年所發表的一本書，叫做基爾特制度之恢復（The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 System）的。在這本書裏，彭提主張回復到中世紀工業自治的原則，手工人就是

基爾特 (Gilia) 的一份子，他所用的工具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決定生產的性質與範圍。彭提的論點一半是基于情感的，一半是基于美學的，是由於對現代大規模的生產與交換之不滿而起的。因為這理由，所以這些工業組織應以工人為基礎的提議，都不能成為現代實際政治。彭提的著作是代表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烏托邦，正如穆理斯 (William Martie) 的著作是代表正統派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一樣的。

直到一九〇九年這學說才得着較實際的形式。從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二這幾年是勞動界最不安靜的時期，其中工聯是有很大力量的。因為這原因，所以霍布孫 (S. G. Hobson) 與阿列支 (A. R. Orage) 在新時代 (New Age) 上遂發表了這種提議，主張以現有的工聯為基礎，採取基爾特的理想以實用到現代實業上去。他們的主張是將實業交付那些與該實業有關係的工人自治，這些工人都集合在一種實業的基爾特制度中，以現有的工聯作這制度的雛形。到一九一二年，這基爾特的理想在工人運動中遂新立了固定的勢力，從此以後，牠的勢力可以從造成這運動的

各個團體所發出之要求的宣言上看出來。尤爲顯著的，就是礦業工人之煤礦國有國管的計劃，這是一九一九年提交礦業委員會 (Coal Industry Commission) 的，這計劃內含著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許多要點。一九一五年初，全國基爾特大同盟 (National Guild League) 即組織成了，其目的就在將基爾特的理想參入到勞動運動的宣傳中；雖然多數工人并未受這種宣傳的影響，然許多勞動界的領袖——尤其是青年的——在今日多少都有點傾向基爾特社會主義了。

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派可以說是少數理論家，他們的目的是想在勞工運動中使那些有力的份子贊成他們的主張，並不是直接的求工人之贊助。

B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原理和目的 全國基爾特大同盟曾說明他的目的，是在「取消工資制度，建立工人的實業自治，以民主化的全國基爾特爲這自治的機關，去和這社會上別的分職代表機關相合作。」這種主張是建立在三種原則上，第二和第三又是第一原則之詳細的應用。

這三條原則是：（一）分職代表民主制（The Principles of Functional Democracy）；（二）實業應由參加腦力，或腕力的人共同管理；（三）個人在社會上的權力與責任應該和他所盡力於社會的職務成比例。

（一）分職代表民主制的原則在政治學上是很有趣味的問題，值得詳細的說一說。造成這原則并用牠去解決實業與政治組織之問題的是柯爾，他將基爾特社會主義擴展了。將這原則應用到政治方面去不是所有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派都贊成的，雖然他們都贊成把牠應用到實業方面。這原則可以說明如下：任何人不能代表別人的；所以過去的一切代表制度都是錯誤的代表制度。不過一個人雖然不能代表他的鄰人，而他却可以代表他的鄰人所共有的一些目的。例如甲，乙，丙同是足球會員，在足球會員這一點上，「子」可以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甲，乙，戊都是建築師，在建築師這一點上，「丑」可以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甲，乙，庚都是新教徒，在新教徒這一點上，「寅」可以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但是子，丑，寅



無論是分開或合在一起不能代表「甲」的一切利益，換言之，即不能代表「甲」自己。由此而推，無論何種代表機關，若求其能實在代表，應該是分職代表制，只有這些機關才真正是民主的，只有他們才能代表他們選民的意志，只有他們才能和個人所做的各種職務相關。所以一個真民主的社會定是許多分職代表機關的綜錯，每個機關代表牠的份子之某種意志或目的。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這樣組成的分職代表民主制究竟能含有那幾種機關。第一，因為人民同是一國家的份子，所以有許多共同的政治利害關係，從前的政治學幾乎只注意到這方面。這些利害關係就是稅收，法律，國防，和教育的維持。這些事務對於一國內的居民有同等的影響，關於這些事務的人民意志最好是由一個國家機關去代表，這機關與現在國會並沒有什麼不同的。至於電氣，水，維持治安的警察，地方娛樂場和其他種種設備，這些事務都是關係住在同一地方的人民的。所以一種地方機關——即以現在的地方政府為模型——用以代表關於這些事務的人民意志

也是適要的組織。

以外還有生產方面的事；這又生出一些特種問題了，因為這些問題遂需要一種新的代表制。關於待遇條件，工作時間，工資和出品量的種種問題，只有同那專爲此事而選出的商店或工廠委員會相一致，才能得着適當的解決。但是出產的性質與範圍，和出產品的價格，也都和消費者有關。所以消費議會(Consumers' Councils)應與生產議會(Producers' Councils)相協商。這些議會的職務與商店或工廠委員會合作以決定耗用和價格的問題。宗教又是別一種問題了，在宗教中個人意志的表示與我們上面所說各種利害關係又迥然不同。

分職代表民主制的學說，是中央集權和萬能的國家觀之反動，牠主張將權力和職務分配於許多機關，使牠們能適當的代表今日複雜社會的人的各種利益。

不過據歷史事實觀察，這特種民主制的學說，假若牠是健全的可以通行於政治方面，必得先要實用於實業方面。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所以如此主張，因為有兩種

理由。第一，他接受了馬克斯的「經濟勢力先於政治勢力」的觀念。他們認為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除非實業方面先變成民主制；並以為假若實業是民主的組織了，政治的民主組織一定隨之而生。第二個理由是，現代實業是在如此的混亂狀態中，若不把牠根本改造，任何方面的社會生活均無健康之可言。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派力言在實業方面之資本主義的方法與動力現正在崩潰中，遲早定有別種東西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其原因就是在現行制度之下，工人不能保持水平線以上的生產了。

因此，基爾特社會主義派雖主張把這分職代表民主制的理論先實用到實業方面，這並不是說牠不能實用到政治與社會方面。正相反，他們力持這分職代表民主制的原則應該擴張到地方和中央政府，並主張在牠已實用於實業之後一定要如此擴張的。

(二)和(三)。將這兩個原則應用到實業方面，遂成功下面的形式：所有重要

的事務與實業都應歸國有。這一點，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是與集產主義者一致的。不過國有雖爲他們所希望的，然而他們並不以爲實業問題隨着實業交付國有以後就算解決。

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極厭惡官僚政治。他們曾指出公共機關的被僱人如倫敦區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的或政府機關裏的所得薪水和待遇并不比私僱的工人好；他們并證明一個專門的文官職務。牠縱然能愉快的指導公有的實業，也不能知道工人的需要和補足他們的提議。所以欲使實業真正民主化，必得從下面組織起。工頭和經理都該歸工人選舉并對他們負責，實業行政的管理才能被這樣有組織的工人而增加效力。這種管理可以交付於基爾特。

基爾特是以現有的工聯爲模型，但他却與工聯有兩個重要不同之點。第一，他是包涵一切勞心勞力的工人，從走僕到經理，只要他們是有關於某種實業的。

第二，牠的重要職務不是在維持牠的份子之利益，而是在促進實業。

因為上面所說的目的與構造都不相同，接着就生出基爾特的行動與工聯的行動之兩種差異了。

(A) 因為工聯從來只注重在增加工資與縮短時間，所以牠只在保護牠的份子以抵禦資本家的進襲。

(B) 工聯雖要求管理權，然在管理權仍在僱主的手中，工人要求的成功只能有消極的性質。牠只能說：「某事不該做」，或「某事不該這樣做」，而不能說「某事必要做」，或「某事必要這樣做」。因此遂引起一種錯誤的概念來，那就是認工聯在本質上即為阻害實業效率的。

上面兩種行動上的差異，就是由於工聯的組織是在仇視社會中以戰鬥為目的的，而基爾特的組織是在友愛社會中以和平為目的的。這是顯然的事。一種工聯——這就是說，一個基爾特，牠的組織是為着和平與生產，而不是為着私益與自衛，牠實在是包括實業的全部工人，完全管理生產方面的事務；牠是直接為社會

的，并且代表生產人的公意，所以不僅能保持資本時代的生產率，并且可以增進與改良。牠所以如此，就因為牠是由於公益的動機，這動機在現在的實業組織下完全被阻害了。

因為這事實，這就是說，因為基爾特是為社會服務的，所以對於那種實業生產的專利為剝削公共而利己的責難，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回答是：這理由不能妨害基爾特的。他們這樣做正常與否，只有這事實可以證明。但是即承認公益的動機之存在，也許牠在實際上不足以戰勝私利的動機；在一切行事上，人類的自利心也許在公益心之前。假若這是事實，那末基爾特社會主義就坍台了，變成一種無治的剝削人的基爾特，牠榨取社會的機會定較諸資本家更多，因為牠在生產方面更壟斷。不過在這心理問題上，不僅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坍台，也就是任何社會主義的坍台；因為假使人類不能以社會利益在先以自己利益（除非是有益於己又有益於社會的）在後，那末，社會的惟一基礎只有建築在今日之自利與競爭上了。我

們前面曾經說過，這是最後的心理問題，我們對於任何社會主義的態度，都視對這問題的回答而決定，這問題在後面另一章裏再略為討論罷。

我們還要指出的就是，雖然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承認他們的計劃之實行視乎人性的某種意念而定，但他們却主張用一種制度以防止基爾特對社會過於提高生產品的價格之傾向。

第一，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主張生產者管理只是求實業之進步。他們相信：實業進步一面靠着精通科學與商務的專門人材，一面也靠着能製造好貨品的手工人。但這并不是要求經濟事務的全部管理，從生產初步到消費末步。這裏所要求的只限於物品之製造與分配的事務。至於價格與剩餘出品分潤的問題，那就和消費者的利益有關了；根於分職代表民主制的原則，關於這些問題之消費者的意志應由消費議會去表示，牠與生產者的基爾特合作以決定價格與剩餘物品之分配。

柯爾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應歸三種消費機關與三種生產機關合辦。第一，有些

大的，關係全國的實業和事務，如礦山，鐵路，煤，航業種種應該歸國家所有，由國家委派專爲此事之代表公共意見的中央機關去與參加這些業務的工人所組織之全國基爾特相協商。第二，有些公用的事務，如氣，水，電，地方交通種種應該歸地方所有，關於這些事務由地方消費機關——即地方政府——和地方基爾特相協商以便負責處理。第三，還有不少製造家常用品的小工業。而今日分配這些用品的小商店，也可以歸於這一類的工業裏。據柯爾的意見，這些小實業無論何時決不會變爲國家有或地方有的。他曾指出這些實業將來定歸合作社所有，合作社社員以地方和國家爲基點所選出的機關，就是這適當的消費議會，關於決定價格與處理分配的職務，遂由牠與從事這些實業的工人之基爾特相協商。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用了這些方法給消費者——爲各種消費議會所代表——一個十足的保障，以防止握生產全權的工人之剝削。使基爾特不能剝削社會以自利的，更有一個納稅的方法。以一種極大的壘進法課基爾特的實業稅，這也足以糾正基爾



特種利益之不平衡。

然而在這種計劃下，國家的地位與職務却發生問題了。我們曾說過有些實業要歸國有，并說及有些事務如國防，法律與治安的保持，和稅收，都是與代表全國人民的國家機關有關係。但是並沒有說到這些機關的性質如何，和牠們對於與現在同樣的國會之關係。在這一點上，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意見是很分歧的。有些人不贊成對於政治組織預定任何法規，以為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社會所必需採取的。全國基爾特大同盟即說過：「任何國家的組織之實在形式，是不能在那種情狀發生之前預定的。」大概說來，這大同盟對於國家是取仇視態度的，牠服膺馬克斯的學說，認現在的國家好像「一個資本階級事務管理委員會。」這種仇視國家為社會主權所在地的觀念，在社會已變為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社會時還繼續着。有一種傾向主張把國家變為一種消費者組織的地位，牠代表基於地域所選出的許多機關，以與大的生產的基爾特相協商。又有些人抱着這種見解，即在基爾特社會主義

的統治下，也還有一些職務只有如今日國家樣的一種政治機關才可以擔負，據我們在第三章（見135—137頁）所說過的看來，他們的這種見解是對的，這似乎無可疑問。

○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方法 最後，我們要看一看基爾特社會主義派所主張的實現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方法了。

基爾特社會主義派常自驕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是帶着極大的實行性的。雖然我們深知沒有一種劇烈的變動，事實上決不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我們也沒有理論上的根據，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能由純然的進化的結果而建設成功。因為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現存的工聯組織上，所以想竭力置一津梁以渡過這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間的鴻溝。而工聯恰是這兩種社會的關鍵。一方面今日的工聯就是將來的基爾特；又一方面以工聯的組織為工具去完成實際的改造。

如我們前面所說，在牠們的構造方面，工聯與基爾特並沒有什麼極大的不同；雖然工聯想完成基爾特的職務，自身必須改造的有兩要點。他們應包羅實業方面所有的工人，和他們應採用奪取實業管理的方法。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的宣傳，就想在工聯的構造與職務上造成這兩種改變。第一，他們主張那些較大和較少的工聯，其構造應該趨于縱的組織(Vertical)，以與橫的組織(Horizontal)相反。一種縱的組織是包羅某實業的一切工人，從極上到極下，從經理到走僕。一種橫的組織是包括同做某特種職務的工人，這種組織也許在許多實業中都一樣。這種橫的工聯——或稱爲手藝工聯——現在是頗多的，牠的外觀比諸大的實業工聯是較狹而且較部分的了，這是很顯然的事。

第二，因爲基爾特社會主義派宣傳的結果，現在，或過去最近幾年裏，工團漸趨于干涉工廠內管理和懲戒的問題了。這種極戰鬥性的工聯現在也採取所謂「侵奪管理權」(Energizing Control)的政策，那就是儘可能的限度內將管理職務交與

工人，并不推翻資本家。這政策有兩個顯著之點。第一是，工聯要求工廠裏的工頭與監督應由組織工聯的全體工人來選舉，因此而附帶的要求是，工頭爲工人所反對時即應撤換。實業組織從下面起，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一個基本的原則，我們在前面已見過了，雖然工聯獲得由工人選舉工頭的事現在還是很少的，然而一二次權利的讓與，也可以視爲達到工人直接管理的重要步驟。

「侵奪管理權」政策之第二個要點就是「團體契約」(Collective Contract)。在大戰時，工聯有一兩次曾與僱主或許多僱主締結團體合同，牠不僅決定出品的質與量，并詳細規定工作的條件與某工廠或商店應付與全體工人之工資的總數。在這種契約之下，工聯保障曾經規定的出品，安排工人的必要監督，管理工頭的進退，并從僱主方面接受總工資，再由某工廠或商店的委員會分發給各工人。

這種「團體契約」的政策現在很少進步，但是顯然的，工人能使僱主同意這種契約，不問是整個的或變形的，其結果，在管理方面他們得着極有價值的經驗了，

再進一步，就是直接的取僱主而代之。

## 第五章 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 引言

將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放在一章裏來討論，這方法是要稍加說明的。共產黨自稱是馬克斯學說的繼承者；而無政府主義派所宗奉的巴枯寧（Bakunin）也曾與馬克斯的黨徒關於這學說的幾要點共同發表過宣言的。一八六九年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在巴爾（Bale）開第四次大會，意見遂發生了，至一八七二年巴枯寧和其他無政府主義派從馬克斯國際裏被趕出來。這兩派的爭點是集中在國家職務的問題上。英國派與德國派是馬克斯的信徒，他們相信即在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後，無論如何，還要保存或種國家的形式；反之，意大利派與法國派要根本的取消國家，他們是以不相信代議政府為立足點。這些被逐出的無政府主義派後來組成一個大聯盟（Federal Union），遂與馬克斯國際會議完全分裂了。

雖然從前有這些爭端，但因現代的發展又有使這兩派思想趨於接近之勢。共產主義因受了俄國「布爾什維克派」的影響，差不多只變成一種工具哲學，這就是說，只是一種方法，用牠從資本主義去達到社會主義的改變；無政府主義則詳細說明社會改變後合作的原則。無政府主義派着眼在他們所希望造成的社會和他們所希求的人類生活之式樣，而共產黨則注意如何去造成這社會及如何去達到這生活式樣的問題；這就是說，前者注重的在目的，而後者注重的在方法。從另一方面說，許多共產黨都承認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理想，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也大致承認共產黨所主張的方法是實現他們的理想之工具。無政府主義的大師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被稱為「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先覺；的確，他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最後狀態（與過渡時代相對）的觀念，是和現代共產主義大致相同的。

所以我們將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一章裏來討論，就是把一個問題的兩半截合起來。前一半討論共產主義，我們即是說明實現那種社會的方法，至于那社會

的本身，却是後半所討論的題目了。

(一)原註：「俄國曾有(現在仍然存在)一種所謂『虛無派的無政府主義』，他們雖着重在方法而不在目的，但是從政治理論方面觀之，他的影響決不重要的。」

## 一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這個字有許多不同的意義。有時候用來指一種社會學說，如初期的基督教徒所主張的，在那樣社會中，一切財產都歸公有；有時他與社會主義混用；更有時他是一種制度的名稱，即在那種制度下，衣，食，醫藥及其他必需品都是自由取用的。我們在本章所要論的，只是共產主義的特別意義，這就是馬克斯和昂格思(Engels)一八四七年在他們所刊發的共產黨宣言中定下的。從此以後，「共產主義」這個字即指一特種政治學說，以別於他種社會主義了。

共產主義就這方面去解釋，只是一種方法論。牠想定下一些原則，用這些原則以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革；牠的兩個重要理論就是階級爭鬥和無產階



級奪取政權了。

A 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

馬克斯著作的要點我們在第三章已約略的敘過了。

然而無論如何，此刻還要將前面曾經說過的重述而且擴張，以便於說明共產主義所根據的基本原則。

馬克斯認為資本主義在本性上即帶着衝突，其結果，資本主義的時代定會走到末日的。這些衝突中最主要的是：（一）因資本主義榨取剩餘的價值——這是他相依為命的為東西——所以他就造成一個有階級意思的無產階級，使他們組織起來，終於戰勝造成他們的資本主義；（二）在這生產增加不息的時代中，多數人反變成無產了，并且資本主義存在一日，他們一日定是這樣的。現代實業制度之大規模的生產，無產階級是沒有如此充分的購買力去買這些貨物的，（三）因為生產與消費的相差逐漸增加，資本家遂不得不在國外找新市場了，同時又組成大的「托辣斯」（Trusts）漸漸把小資本家壓倒，對於該種貨物遂獲得一種獨賣權。因為生產

的增加，海外市場的競爭遂日見利害；對於未發展的國家更實行猛烈的榨取，所以資本主義經過帝國主義與世界戰爭的階段遂到着頂點了。

共產黨常自負近年來的事實就是馬克斯的預料一個極顯著的證明。他們解釋近來的事實是這樣的：這次世界戰爭的根源為經濟的。生產力越過了現存的社會組織，其結果出產過剩，社會不能操縱其用途了。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工人中，生出這樣刺眼的不勞而獲的富翁，更加之新市場的競爭，在帝國主義的外置下，戰爭遂為不可避免的結果了。舉例言之，列寧(Lenin)下帝國主義的定義是「資本主義發達之最後階段，那時候，資本獨佔達到最優勝的勢力，資本輸出也成為極重要的事，國際「托辣斯」遂起而分配世界，一些最大資本主義的國家遂將整個的地球瓜分了。」這時候，資本主義的衝突是自速其滅亡。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無產階級，其勢力遂推翻了資本主義。因為無產階級的要求日漸增加與堅持，最後什麼都不能使牠滿意了，除非全部沒收這些榨取者，所以從前一切私人的財產至此皆歸

公有，一切權力也移到武裝工人的手裏去。

無產階級的興起在歷史上並不是沒有相像的事例。事實上，每個階級或遲或早都會在社會上佔過優勝的地位，然後又爲牠本身所造成的另一階級推翻。如中產階級 (Bourgeoisie) 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因爲工商業的發展牠遂推翻了封建制度。不過歷史雖供給了相像的事例，而無產階級的興起究竟有一點不同。從前一切的革命都是一階級壓迫一階級，和少數人反抗少數人的結果。而勞動階級的戰勝是要解放人類的。雖然這革命的進行也是以階級爲基礎，但革命以後的社會是要化除一切階級。因此共產黨認爲他們的戰鬥雖表面上是爲着無產階級，而實際是爲全人類而戰；因爲這種信心，包裹在由別種理想而生出的熱態中，所以在那種太乾燥太理論的政綱下遂生出犧牲的力量來。

然而解放人類與化除階級雖爲共產黨最後的目的，不過在馬克斯看來，這目的並不是數年即可實現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雖可以鋪好到這種烏托邦的道路，但牠

并不能馬上造成的。馬克斯認為在革命進程中有兩個不同的時期，這觀念是被後來共產黨接受了：（一）過渡或革命時期，在這時期裏，勞工階級掌握政權；（二）共產或平等時期，在這時期裏，這當作權力所在的國家遂消滅了。爲便利起見，我們將這兩個時期分開的討論。

（一）革命時期 共產黨反對第三章所述過的進化社會主義派之理論，他們堅持國家沒有極大的變動，社會構造是不會有根本改革的。過去的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會（Paris Commune）曾告訴他們勞工階級決不能僅將現在資本主義的國家這機器拿過來，就可以用牠去達到他們的目的。現在的國家這機器是不適宜於革命的；官吏不負責任，行動沒有能力，不能單靠換了幾個管理人就可以使牠的本質改變的。因此，一旦資本家還操有生產的工具，而勞動黨即取得政權也是無價值的。因爲資本家保有這種工具，他們就可以使勞工黨得勢的議會只能通過一些無關乎實業痛癢之法律。縱然這種政黨要想通過沒收資本家并將他們的財產收

歸社會的法案，而資本家一定設法避免的，最後，或者還要為他們的特權作防禦戰。共產黨認為英國工黨勢力之增長，與他們對於資本家統治的反抗之失敗成比例，就可以完全證明這觀念了。

因此，今日的共產黨極力主張拋棄那種憲法的方法 (Constitutional means)，根本除消現存的國家這機器，而代以一種無產階級的獨裁。所以在推翻資本階級之後，他們還是毫不遲疑的要加重這爭鬥的嚴酷。工人的武力不僅在打倒資本家，還要用牠以抵抗資本家的反動。昂格耳說過「革命成功後的共產黨，定要用恐怖維持他們的統治，這種恐怖就是鎮攝反對人的武器。假若巴黎公會不是基于武裝民衆的力量去反對中產階級，牠能以支持到二十四點鐘以上嗎？」

在此處所要指出的是，中產階級有較好的教育，訓練，與武事才能。他們戰鬥的工具，可以自由使用，金錢的供給又頗充足。因此，縱然有一種突然革命行動將他們打倒了，而要他們不利用那些優點以圖復起，這是不可希望的事。

列寧說：「在任何與每個大革命中，榨取者之長久的堅強的兇猛的抵抗，造成一種局面，他們因為各種優點，較被榨取者總佔幾年優勢的。榨取者決不會承認多數被榨取者之要求，而不利用他們自己的優點以作最後的戰鬥。」因此，「從資本主義渡到共產主義就形成一個很長的時期了。」

在這時期中，造成列寧所稱的那種工人的「半國家」(Quasi state)以代替現存的中產階級之國家。這種新國家定是一階級的組織，牠的職務是代表革命的勞工階級的。馬克斯說，「為打破中產階級的抵抗，工人定要給這國家一種革命的形勢。」所以在這時期中，這國家是壓迫而且專制的；牠要使用強迫的武力，不會是純民主的；這就是說，牠不是代表國家內各黨的。反之，牠只是代表一黨——即所謂無產階級，牠為這一黨所利用以壓迫中產階級。

昂格耳說，「因為這種國家只是暫時的組織，只是在革命中用之以壓制反對派的，所以說什麼自由或民衆的國家，直是蠢話：一日無產階級需要這種國家，一日

都不是爲着自由的，而只是壓迫反對派；直到這國家不存在了，那時候才說得上自由。」

所以引了這許多話，就因爲共產主義的運動是不是民主政治的運動，爲一個極大爭論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說到的。此處所指出的就是，在這種革命期中，民主政治被視爲不可行而且不必需的東西了。

(二) 革命完成後的時期 這種國家在壓迫中產階級進程中自身也漸漸趨於降落；到這目的完全達到，牠就變成無用之物了。因爲牠的組織是以一階級爲基礎去超過階級利益，到着階級消除的時候，牠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照列寧的說法，牠就「消滅」(Wither away)了，讓一種爲執行公共事務所組織的自由社會去代替。這種社會的來到，就是革命時期終止的證明，這完全自由的狀態也就是無政府主義所力求的，我們在本章的後半再詳爲敘寫罷。

B 共產主義在理論上之最近的发展 上面所說的是給馬克斯學說的幾要點一個

簡單的記述，這幾點爲現代的共產黨所注重和發揮的。不過馬克斯的著作很易於有不同的解釋，從這種不同解釋上，遂生出一種絕不相同的方法哲學來，這是我們在第三章跡求集產主義（或稱進化的社會主義）之生長時已見過了。最近的事實，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之俄國革命，不但給了共產主義一種實際的意義，并在理論方面自然而然的引到新發展上去了。這些發展不是否認馬克斯的學說，而只是注重他的學說之某一點以犧牲其餘的。俄國共產主義給馬克斯的著作一種奇特的轉變，雖然還未拋開牠的實質。因爲這轉變的結果，共產黨最近比從前肯多注意到民主政治的問題了，列寧的許多著作，尤其是在他回答考特斯基的一文裏（一），專注民主主義對共產主義的關係及其程度的一問題上。

（一）原註：一九一九年考特斯基在維也納發印一文題爲「無產階級之專政」，對於當時俄國所行的共產主義之原理與方法曾加以猛烈的批評，大半立足點是說他們已與馬克斯的學說分離了。

爲求知道這問題在今日的重要，我們應該回顧到十九世紀後半期共產主義運動



的歷史。一八八九年所組成的第二國際是道地的馬克斯派，但也是從來宣傳馬克斯主義團體中之最缺乏戰鬥性的。誠然，牠的組織較諸第一國際時代所有的工人組織要高出一等，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與二十世紀前十年更眼見工人的組織在數與力的兩方面均大增了。

但是伴着組織的增加而來的就是革命精神的減少。和平的時期，即是實業大擴張的時期，也就是比較富裕的時期。結果，從資本階級方面很便易得到讓步，這似乎證明馬克斯的預料是過分的悲觀，因此遂生出從勞工階級選舉的力量漸漸的，和平的去達到社會主義的希望來。然而這些希望都是空想。

在世界大戰以前，就有工團主義派的革命是以馬克斯學說之戰鬥性的解釋為基點，世界戰爭使革命的國際社會主義又增加生氣了。這戰爭有幾點幫助了戰鬥派；最有助於他們的，就是促成社會主義中之革命派與進化派的分裂，使他們對於這兩派社會主義將來能否一致行動發生懷疑了。這戰爭逼人走到這兩條歧路上；

盡忠於階級，抑効力於國家呢？選擇到臨了，事實使他們難於遵照他們的預定。

爲愛國心所驅使的社會黨，他們與他們的主義教他們不要信任的政府合作了，并從事激勵工人去入伍以便殺戮別國的工人，這些工人是國際會議教他們認作同胞的。有些社會黨并在這中產階級的政府中做官哩。

站在另一方的社會黨，他們爲這些事實所逼迫，又恰走到相反的極端。因爲他們不願爲不可饒恕的攻擊而犧牲的國家作戰，受了各交戰國家的處置與監禁，他們的態度遂趨於絕對的反對國家之一途了。在戰時，一個公民因爲不承認國家的權力，或認別種權力還在國家之先，他就很有理由去拒絕爲國家而戰，這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派所持的見解。因爲在大戰中看見馬克斯的預料之實現，所以他們不承認國家的分野，主張忠於戰鬥的勞工階級之運動，於是遂組成第三國際了。

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成立於莫斯科，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搶得政權的共產黨所組織的。牠的最重的工作之一就是發了一篇宣言，這宣言是將革命的共產主義之原

理復述一遍。實際上這些話與我們已述過的馬克斯和昂格思所發表的一樣。一個新的特點就是對於戰鬥的共產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通常概念的必然差異之注重。

共產主義與民主政治 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小心記住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過渡的國家，與代前種而起的最終社會之區分。說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共產黨的態度是基於相信在現時情狀之下民主政治決不會實現的，比基於不信任民主政治或嫌惡多數政治還要利害些。一日多數人是無產的，我們就說不上什麼個人自由和以人力去決定他們所生存的社會之法度。因為當他除却賣勞力給出價最高的人之外就別無他法的時候，個人是無自由之可言的，關於他希望達到的生活他也是不能自主。說到政府的構造，無論形式上是多麼民主的，但社會權力所在地不是政府，而是因佔有生產工具遂佔有經濟勢力的資本家。

以工人應該受教育為藉口，又不能使他們與他們的剝奪者站在同等的地位，這只有將事情弄得更壞；稍受教育的無產階級之存在，足以使剝奪者更加緊他們的鎖

鍊。因為他們支配教育，報紙，和公共講台，他們就利用這些機關以麻醉（Dope）工人的腦筋，這後者是很易於受資本家的影響的。因此，當一切宣傳工具都為資本家所管理時，我們就無法希望全體工人的得勝。這種情形還要繼續下去，直到與大戰中俄國所產出的相似的情景之發生，就是常有階級意識的少數感覺到他們的行動一定會得着多數幫助的時候。到了這種情境，共產黨即認為資本主義時代的了結，他們并認為在這時期中希望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是無用的，這就是說一種民主政治是蘊育在便於中產階級的觀念中，以便壓迫勞工階級的。

至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代，情形又不同了。這時代所謂民主政治只是工人的，因為只有他們希望這時代繼續時，這時代才能繼續下去；這不是基於全體人民同意的一種純民主政治。被搾取階級的民主政治不能代表搾取階級的真意志，正與現存的搾取階級之民主政治不能代表被搾取階級的真意志一樣。

因為在革命時期之前，純民主政治是辦不到的；在革命時期中，純民主政治也

是不可能的。所以共產黨之反資本主義的戰鬥，只是基於少數人意志上的戰鬥力，而不是得着一般的同意。在許多人看來，這是一個很可悲觀的現象，實在的，共產黨所以異於別種社會主義者，就因為他們相信對資本主義的戰鬥是不可避免的，並且這戰鬥的兩方均激烈而且持久。他們不承認他們的政策一定失望。反之他們却認為革命的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希望之源，否則，這世界就破產了。這些戰鬥很迅速的破壞文化，除非資本主義被推翻了。戰爭復戰爭，饑餓復瘟疫，直到這社會走入資本主義的勢力全部毀滅之一途。每次新戰爭將和平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所獲得的些微利益都毀壞了；在危險時期這些利益既被棄在一邊，所以遂生出反動來。假如這世界可以從那在社會進化中已經活着較久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罪惡中救出來，這救助只能從那帶着決心要推翻資本主義（當時機來到時）和知道怎樣去代替牠的一種極有力而且絕對革命性的黨得到。

## 二 無政府主義

列寧有一種見解，這見解也是爲許多共產黨人所贊同的，那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完成牠的目的之後，國家這機器就將被取消。

基於工人之武力的「半國家」會依次「消滅」掉，讓所謂自由組織的社會去代替。這種自由組織的社會就是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這社會依無政府主義的大師克魯泡特金的說法，是「一種生活與行爲的原則：社會浸潤在這種原則中是沒有什麼政府的。在這樣社會裡，和諧不是由於服從法律或服從任何權威得到的，而是得自爲生產與消費的目的和爲滿足一個文明人之各種需要與欲望所自由組織的各種團體，地域的或職業的」。

至關於如何才能實現這社會的問題，無政府主義并未說及。誠然，克魯泡特金會自稱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是從分析現在社會之漸漸生長的趨向而來，並不是一種不可實現的烏托邦。他爲維持這種主張，曾指出因機器的增加，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給遂變爲極簡易，和近來非政治目的的自由組織的激增之事實來。雖然

他所說的事實都是實在的，但是這些事實是不是趨於如他所假定的一途，這還成爲問題；這就是說沒有革命的動作，社會在自然進化中能不能照無政府主義的路線去發展，還是疑問哩。我們所能斷定的，就是現時有一個極明顯的潮流，趨向於反集權主義與職務的分散，這是在第二章已敘過了。這趨向頗合於無政府主義中的一顯著特點之「地方主義」(Localism)，牠恰與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之中央集權的特性相反了。

在本章裏，我們只能將無政府主義當作一種理想來研究，我們不必問牠如何才能實現，因為對於這問題共產主義已回答過了，那是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都同意的。

無政府主義派宣稱只有在一個無政府的社會裏，個人才能發展他的完全天性，并實現他內心所有的一切。必得外界的限制都沒有了，才能使個性得着完全的發展：個人是第一次得到真實的解放。假若我們問他從什麼地方解放了，這回答

就是：「從各種威權下解放了」，我們現在將各種威權——就是無政府主義要使人類從牠們到着解放的——列舉出來，并說明無政府主義所以要這樣做的理由，以便於深知牠的性質。

無政府主義要使個人從牠們得到解放的威權可以分作三種：

(一)從資本家束縛下解放，成一個自由的生產者。

(二)從國家束縛下解放，成一個自由的人民。

(三)從偽善的道德觀和萬能的上帝觀之威權下解放，成一個自由的個人。

這第三點是倫理問題，出了本書範圍之外，而第一點又是從經濟與道德兩方面對於資本主義的訴狀，這是很尋常的，也不用再述了。我們所要敘寫的只是第二點，這於無政府主義有特別意義的。

政府是必要的麼？在經濟方面，無政府主義主張一般的共產，克魯泡特金曾說：「一切東西屬於各個人。假如每個男女在必需品的生產上盡了他的或她的相



當的力量，他們對於任何人的生產品都有分得的權利。」

問題馬上就發生了，「要不要或種政府使各個人的分配得其公平呢？」無政府主義者的回答是否定的，這與馬克斯派的共產黨相反。他更力說過去的一切政府之重要職務就是使各個人的分配不得其平。

對於專制政治與少數政治，這種說法顯然是對的。一人或少數人的專政顯然與權力平等不相容，縱然在理論上牠不與財產平等相背，然而牠總是使那操有權力的人多佔些世界上的物品。

但是這種說法也可適用於基於多數政治之代議政府麼？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是的。他并辨明不但現在的國家爲不必需而且有害的東西，并以爲將來任何形式的國家也是如此。

後面所說的就是他的辯證之主要理由：

△ 不信任現存的國家      今日的国家是少數人用來保護他們對於財產的不公平

的獨佔權之工具，這些財產是應該屬於全體的。因為這理由，所以決不能用國家以取消牠所保護的獨佔權。所以一旦國家不為別種組織所替代，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也一日不會消滅的。總而言之，國家這東西決不能用來以達到新社會之目的，如一班社會主義者所提示。

因為這理由，所以無政府主義派反對現在政府的職務之擴張，縱然那些職務表面上是為羣衆利益的，他們也不鼓勵工人去加入政黨，或取得國家議會的選舉。

B. 代議政治的虛偽 這上面的論調不僅可以用來反對現在的國家，還可以用來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因為國家的本質就是一個中央代表機關行使職權的。

在任何問題發生時，國家找不着人民的意志，於是只得用代議政治去處理，否則便無所異於專制了。代議民主制的理論是由人民選出一班代表，在一定時期內，由他們代表并執行人民的意欲。但是沒有人可以適當的代表別人，尤其是別的一羣人。第一，他沒有那種知識足以適當的解決一切發生的問題。一個人只能知

道他實際所經歷的事，在任何事務中，只有那種事務的工人自己才是最好的指導者。所以代議政府只是那些人的政府，他們樣樣事都知道些足以使他們將樣樣事做壞，而不能知道任何事足以使他們將任何事做好。這遂生出職業的政客——此處所謂職業的，是指他以職業代替了智識，——職業的法官，和職業的牧師來，他們是人類關係的處理者，他們的職務是在延長人類的弱點，他們就以這弱點為滋養料。政客劃分國界毫沒有人種學和地理的智識；法官決定事情的意義，目的，和動機，只憑着極粗淺的心理學上的知識了。所以無政府主義以此為一辯點，那就是寧可讓專門家指導，不願給外行（Amateurs）來管理。

第二，關於國家所要解決的各個問題，公意自身可以有兩種表示的方法。或是代表在暗中摸索不能為他所代表的人謀利益，或是在每個問題發生的時候，他就召集他所代表的人開會，討論之後他才把他們的意見作成一個說明。但是在後種情形之下，他的職務是不必罷了。

因此，代議制度這東西，牠不是不必需，就是不足以代表。要想使公意得着真實的表示，其惟一的方法就是：召集有關係的人民來開會議，委定一位專爲此事的代表以表自在這會議中他們所討論的某問題之意見，并即行停止他的代表資格，當他將人民對於該問題的意見表白之後。不能允許任何代表來制定法律以處理他被選爲代表之範圍以外的一切事務。

上面所提出的方法已等於不信任代議政府的效能了，所以一般的民主主義者都認牠爲不當；但這種方法却爲知識社會和事務人員所採用了，當他們對於某問題希望得到一致或表示一致的時候。

C. 權力的結果 以權力加諸別人的人，一定會自損其天性的。這足以使他們自私，驕傲，與專橫，成爲自己的目的追求者而忘却給與他們權力的那些人之利益。舉例言之，政客所以壞不是因爲他的本性，而是因爲他的地位；不是因爲他是一個人，而是因爲他是一個政客。所以政府的權力是決不能信託於一人或一羣

人之手的。

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取消基於武力的政府，與他過於相信個人成一對照，但無政府主義者的回答却是，事實上他是過於不相信個人哩。因為他不相信人性，所以不讓他人治理，所以克魯泡特金這樣說「這個或那個官僚也許是一個好人，假若沒有把權力交給他」。

愛好權力是政府所滋生出來的，牠又只能因行使權力而滋長，而行使權力一定要有被行使權力的人。所以政府的本性就是使用武力，武力將原來是朋友的人類分成互相仇視的國民，武力將原來是同胞的人類分成互相仇視的階級。依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內爭與外戰的罪惡都是直接由政府惹起的；狄更生 (Mr. Edward T. C. Kinson) 的現代論壇 (Modern Symposium) 書中引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的話，「政府就是壓迫，排斥，與分離；而無政府是自由，聯合，與親愛。政府是基於自私與恐怖，而無政府是基於友誼。因為我們把我們自己分成許多民族，所以就忍

受武力的壓迫了；因為我們把我們自己劃爲個人，所以就引起法律的保護了。」

D. 國家爲什麼無用呢？無政府主義者用具體的說明來維持他的那以國家爲廢物之主張。舉例來說，「教育需要國家嗎？」答曰否。假若給多數工人以安裕，使他們能教育他們自己，他們之間定會有一些酷好教育的人去熱心教育別人，於是多數自由教育的團體遂發生了，並且在教導方面彼此更設法爭勝。

抵制外國的攻擊需要國家嗎？他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克魯泡特金說，國家的正式軍隊總是被攻掠者打敗了，歷史上只有不是國家組織的而一時勃起的民衆才能驅除攻掠者。

說國家能保障個人的安全也是空話。更不能保護人民免除牠所造成的那些窮人之侵害。牠使人因貪財而犯罪，這種貪財却是牠那不好的經濟制度所引起的，牠反而懲罰他們，將他們送到牢獄裏，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罪過，使他們將來再不能用誠實的方法以謀生。

國家所不會干預的藝術，科學，和商業，在這些活動中，人類顯出最多的能力，獲得最多的進步，關於這些方面的自由活動都由自願的組織，俱樂部，學院和結社表現出來了。管理這些活動的團體，如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與大英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等，牠們辦理必需事務都是基於自由合作，而不是基於強迫的。

至於商務方面，克魯泡特金曾引國際鐵路運輸的辦法作他的論旨之說明。一位旅客從麻德里德(Madrid)到莫斯科，他經過的鐵道是數百萬工人造成的，他乘坐的火車是好幾十工人開行的。保持鐵路暢行無阻之這樣繁複的事務，全靠着有關係的各人之自動的努力才能做到。自由合作替代了強迫，自動的支配替代了強制的管理。

自由社會的組織 在這方面，我們就找得着社會的組織可以代替國家了。我們若問國家取消後秩序是如何維持公共事業是如何辦理，這回答就是由於爲實行

這特種目的所組成的自願團體。每種事務歸一團體所管理，這團體是參加這種事務的人自由組織的，牠選舉并撤換牠自己的職員，決定牠自己的策略，并自動的與別個相同的團體合作。這種有秩序而無強迫的交錯組織形成一個基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遂由此而成立了。這正如狄更生所假定的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無政府「不是沒有秩序；而是沒有武力。」

這些組織，團體，和聯合有各種各樣的，牠們是為各種目的而組成的。因為這些勢力的平衡，所以社會得以和諧。此地所說的「平衡」這個字，并不是指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是靜止的，——是一個死板的社會；反之，那造成社會之各種自由組織的勢力在程度與趨向兩方面均在不斷的變動中，所以他們之間的平衡也需要時常的改正。但是那裏既沒有優勢的組織，也沒有特權階級，更沒有國家保護某一團體而犧牲別團體，所以這平衡是較在現在情形之下易於達到些。各種自願團體為滿足人們所共有的各種目的而存在；有些是以職業為基礎而組成的，有些以地域為



基礎，牠們互相合作，執行現在為國家所專有的全部職務。用現代一個術語，無政府主義是最先主張分權的，關於地域與職業兩方面。牠的社會構造是基於極小的組織上面，或為一村或為一店的，牠相信其餘的社會都由這極小的基點發展起。這種發展在牠的本質上總是由單簡趨於複雜。在現在的社會，極單簡與極小的團體視為毫不重要；而在無政府主義之下，牠却變為極重要了，事實上，牠變為全個構造的樞紐哩。

假使我們提出這種疑問，「在那時候，誰來糾正這各團體的利益，防止牠們的傾軋，保持牠們之間的善意呢？」這回答是，那時人民既受過適當的教育，既沒有貧富不均以激起不滿，又沒有國家保護壟斷者以促進之，利益是很少衝突的，傾軋的機會也就不容易見了。

人民的造法權既不被政府的懷柔所毀壞，人民的利益也不被政府的干涉所阻遏，他們得着自由與完全的發展，社會性的情緒一定會增長到極大的限度，為今日

所不能夢見的。競爭滋生出仇恨，沒有競爭，人類友愛的天性必日漸增長，到那時候，他們對於別個團體不視為可怕的競爭者，或是應征服的敵人，而視為友誼的團體，需要并歡迎他們的合作。

他們力辯以自由結合為原則之行爲將產生出一種社會的天然集團，這種天然集團，較諸今日政府所造成的人為集團，要和諧些，滿意些，并有力些，以至使牠不易於為衝突所擾動，甚至那些衝突也不會起的。

傅立葉說：「拿些亂石子放在一口箱子裏，將牠們搖動幾下，牠們就會自己排列得非常好，你即教任何人去擺列也不能有那樣的合式。」

上面所說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之一個簡短而未具體的綱要。牠所以不具體，就因為這學說的綱要雖然簡單，但是僅有一個綱要。從牠的簡單——這是無政府主義與各種極端學說所共有的——遂生出了牠的「似是性」(Plausibility)；不過這種「似是性」恐怕只是騙人的，大半原因就由於贊成無政府主義的人不願或不

能將這種引人的綱要詳細補充起來。

至關於無政府主義派主張將國家完全取消，不問牠是一種中央政府或只是社會的權力寄託處，我們在下章再稍作考查罷。

## 第六章 社會主義之各種問題

前三章所說到各種社會主義遂引起許多重要問題了。有些問題發生很大的爭論，究竟有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用來解決這些問題而能不顯然受反對的，這還是疑問。同時，我們若對於現時一些實際重要問題不加一番研究，我們的考察也不完全。

我們的研究是很簡單的，只限於三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一）心理問題，社會主義能不能給人一種十足的工作之引力；（二）分職代表民主制的問題；（三）社會主義之進化派與革命派各個所爭持的造成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各種方法的優點。

（一）工作的引力 人類除去為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之外，能不能使他們去工作，這問題，如我們所見，是各種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除非社會主義派對此問題的假定是對的，各種社會主義都不能實行了。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常說，人類只

能爲自己而工作，或是只能爲自己而工作好，對於社會利益一般人是很冷淡的。所以自己爲自己總比別人作得好些和因此可以分得較多的利益之動機是工作惟一的促力，靠着牠現在的生產率才能保持。若然，則自利與競爭是社會之惟一可能的基礎了。

依現在的經驗，我們還不敢斷然的說這些辯證之實在。後面的研究可以進而指出牠們無論如何還不是定準的。

(A) 反對社會主義的論據，是由於假定人類天然厭惡工作。這假定是非常可疑的。誠然，在現在的人們間已養成一種厭棄工作的偏性，然而這只是因爲他們常受着呆笨工作和工作過度之苦。一個人每天費去八九點鐘在那種單調的手工中，自然而然的會幻想到一種烏託邦，在那裏他什麼事也不用做；而知道他的工作之主要目的是爲別人賺錢，尤足以促進他的惰性之猛烈。多數人爲維持生活消去他們的工作生活三分之二，只有三分之一是享受其餘的生活的。在這樣情形中，他們

自會推想到當生活品自由供給時，人類欲望的全體定可以被這種享樂而滿足了。

然而這推想是錯誤的。多數人都愛好工作，雖然他們不是十分的愛好；他們並且發覺純享樂生活是一種十分討厭的生活。伯納蕭說：「地獄的最好定義就是長久的假期」；因為幸福的最好包單就是不要有充足的閒暇以想到我們究竟幸不幸，這種說法，於我們多數都是對的。

一個人在賺得些財產之後，他遂設法享樂牠，這行為可以說明我們的論斷。他一生都為賺錢而工作，於是遂感覺厭倦了，使他想去點別的事。他因此以他工作所賺來的財產大半消費於冒險的或辛苦的嗜好中，如爬山，探險，或游船競賽等，為僱人陪他幹這些勾當，他不惜給予大批的金錢。這樣幹過了，他又常回到事業上去再賺他所不需要的金錢，因為他已習於勞苦的工作，沒有工作又使他的生活難受了。

有些人，如游歷家與藝術家等，固天然不喜歡工作；但這種不願做事的游歷

家，或是他只做他所願做的事之藝術家總是很少的。努力是人類的天性，假若他們不能爲自己而工作，他們也定要爲別人而工作的。

如克魯泡特金所說：「使人類天性發生厭惡的是過度工作而不是工作，……工作，勞動是一種生理的必要，這必要是消磨富積之體力的，這必要也就是健康生活的本體。」

因此，我們所需求的只是使工作質的變換和量的減少。假若這事辦到了，我們儘可以預料多數人一定喜歡工作的。

然而關於那些齷齪工作，笨重工作，和危險工作又如何辦呢？人們若不爲發財也願意作這些工作麼？對於這問題的回答使我們走到第二個研究上去了。

(B) 在一個基於公益原則而不是基於私利原則的社會裏，許多齷齪，討厭的工作定會減少，這是很可能的事。這種減少因應用科學知識到實業上去而益顯。現在科學應於實業的只限於值錢的工作方面，並不使用機器去作齷齪的，粗笨的

工作，因為粗笨的勞力比機器更更易得到些。因此，工人仍然被僱用於極不衛生的情境中去在輪船火艙裏燒火爐，僅因為燒火機器的安置會減少公司的利益呵。

再引克魯泡特金的話：「假若還有工作本身就是討厭的，這只因為我們的科學家不曾注意設方法去改良牠；他們只知道有許多嗷嗷待哺的工人，為賺幾個『辨士』一天，一定願意作這些討厭工作的。」假使實業是為着全體社會的利益，那末，工人是社會的份子，對於他們的娛樂就應該給以相當的注意，科學的用途應完全以減除離離工作或用機器去作牠為目的。也許將來還有這種工作要做的，對於願意做這種工作的人應給以特別的誘力，或為金錢或為信用。

(C) 公益的動機 通常認為人類於公益的動機是很冷淡的。然而這信念只是一種謬誤。人類作那些有益於他人的事，以至於完成社會上許多極困難極危險的事業，究竟是由於公益的動機，或是如做世主義者所說，由於希望得到信用與名譽呢？一個去當敢死隊的志願兵，他並不希望得到額外的薪水才去以他的生命



爲孤注，而其背景是由於他的英雄的衝動和救人類的欲望或是和欲獲得維多利亞的  
獎章 (Victoria Cross) 之動機相混合。

而且這些動機也不是非常人在非常時候才有的。在一切小的社會中，爲社會服務和與社會合作的欲望是常在的，這是人類生活中一最有力的因子。學生爲學校爭勝，僧人爲宗教努力，都是這種欲望的表現。但是這種欲望并不是一件自動的機械，牠常要有所倚託的；牠必須社會給以鼓勵與生氣。然而現在牠是得不到這種鼓勵的。範疇人類思想的宣傳機關均爲那些人所操縱，牠們的注意力只限於現在競爭制度的維持。進行自利事業的德性得到極端的稱許，而與社會合作的和以個人附屬於全體利益的德性却被忽略甚至被輕視了，除了在戰爭中當資本主義的制度從外面受着威嚇而需要這些德性的時候。

能範疇成年人的思想之勢力更能模型青年人的了。教育多說到愛國，教個人爲謀他所屬的國家之福利可以犧牲別國的人民；但教育不談到公益，教個人爲社會

謀福利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教他爲他的國家而戰鬥，但是爲他自己而工作。

結果，青年的腦筋不知不覺的浸透了一種信仰，那就是工作的惟一目的是爲自己和家庭賺錢的，而爲社會工作只是熱情的白癡。

然而改變決定輿論價值的權衡並非不可能的事。輿論大半由兩種機關所造成的，那就是教育與報紙。改變教育的精神和改變操縱報紙的勢力，這就可以使公共意見趨於重視爲社會的努力以反於爲個人的自利了。國家給予最高榮譽與最大報酬的，不是那些犧牲社會而自富的人，而是那些不爲自己謀利益而最能增進他人幸福的人，這種改變的實際效果遂因此可以得到了。

但我們必須承認的，社會主義派所希望的公益動機雖然用這些方法可以發展，但僅能在最小的社會裏才行之有效；這斷論又引起另一個問題了，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面分職代表民主制的目中再爲討論罷。

(D) 社會主義下的工作之酬報 說在社會主義下懶惰一定流行，生產一定

減少，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只要我們記得多數社會主義都是主張各個人應該作相當工作的。大致說來，集產主義派的理論是只有工作才給以享受生產品的權利，他們反對現在制度一個最重要的訴狀，就是說許多人享受他人勞力所生產的財富。

「只消費不生產」，集產主義派認為是最大的罪過，所以除去老年人和殘廢人之外，社會主義派並不主張給生活必需品與那些有工作而不願做的人。在基爾特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沒有理由假設生產者的基爾特會抱不同的見解的；說到共產主義，蘇俄強迫工作曾得着歐洲學者的嚴厲批評，認牠為專制。只有無政府主義才主張將公有的物品分配於一切人，不加以任何工作的限制。無政府主義派以為在他們所主張的社會裏，實際上各人都願意工作的。因為這理由（如前面（a）節所說），社會主義的統治多一天，那由現在實業競爭制度所生的厭惡工作之偏性就多消滅些，這種情形是很可能的，而且定會漸漸變成如此的。

無論如何，武斷無政府主義的概念可以實行很長的時間，這是太粗鹵了，而集

產主義者的計劃主張每人都應該作工，倒比較可以實行的。這計劃是在社會中定有一個團體的存在，牠在必要時可以使用所保留的武力的；而否認國家的無政府主義對於工作問題遂發生實際困難了。

反對集產主義計劃的論調也就是用之反對任何強迫的。既說個人必須作工然後才有享受生活必需品的權利；但是誰來決定何種工作才能算數呢？畫幾幅不為世界所需求的畫，或是做幾篇攻擊政府的文章也可以算是工作麼？

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將這些問題不由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去決定，而交給生產者的基爾特，在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各人都必需組織起來，無論他的職業是什麼。分職代表民主治的原理主張關於工作與報酬的問題應交給職業團體去決定，就是這原理我們現在要簡短的考究一下。

(二)分職代表民主制 我們前面所說到的各種主義，如一個連串，都堅持分權的重要。工團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無論他們在別方

面是如何的不同，但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以無限制的國家管理代替現存的私人統治，這種社會主義的舊概念已經過去了。就是集產主義派也不復維持那種由一班官僚和武人所造成的國家之萬能觀了（縱然他們從前這樣主張過，成爲他們的極端形式）；因此，雖然基爾特社會主義派與他們是以此爲分點，但他們現在幾乎變成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一樣，承認分權的重要和地方與職業機關行使管理權，與中央機關相對抗了。

現在大家對於中央集權政府的官僚政治之必然結果都很厭惡，這一點我們在一章國家哲學觀上已提過了。如我們前面所指示，人類將屬於日漸增加的各種自由組織，這些組織把國家的界限切斷了，並且漸漸的取得國家各種職務，正如牠們從前攫取人民的利益一樣。這種組織將日見增加，這是無可疑問的，克魯泡特金曾說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即由現在的社會趨勢分析而來。然而這些組織在政治學說上的重要現還在顯著中，不過甚爲顯然的是，人類結合的生氣和促進個人達到完全發展

的力量已經離開了他們過去所寄託的國家，而變為各種較小的組織之德性了。

希臘人曾說過，一個人在社會中他才能實現他的一切的天賦，這於希臘市府國家很實在的，但不適用於我們現在稱作國家的這種政治社會了，這種說法，現在變為只能適用於代表較狹的與較直接的利益之團體。

社會主義者認為足以引起公益熱忱的是這種團體，而不是國家，靠着這種團體社會主義的實際效能才能存在。社會主義派這種觀念改變的理由，就是因為現在的國家長得太大了，大到不能代表組織牠的份子之意志。社會上的勢力是如此龐大，政府的組織是如此複雜與精巧，決定事務的因子是如此奧妙，使人們不但不能操縱牠們，甚至於不能了解牠們了。對於這樣複雜的社會組織，個人覺得無能為力。他既不能由於公意的一因子又不能由於明顯的個人意志可以影響一切的事務。所有一切似乎多是盲目的，不可制的勢力之表現，而很少是人類意志與努力的結果。人類的生機被忽視了，人類的目的——假若有目的——被蒙在神祕中。

在這樣情形中，有思想的人自然懶得問政治；假若他們一想到政治，他們定會存着這種觀念，如英國文學家哈德（Mr. Hardy）在他的小說裏常告訴我們的一樣，人世間的現象只是盲目無情的「命運」所主宰，牠對於人類的疾苦毫不關心，阻撓我們而却沒有惡意，幫助我們又沒有方法。於是政治的定命主義之學說遂流行了。人們覺得他們沒有力量改變他們所生存的世界，他們不為社會所注意，他們的意志與希望也覺毫無重要。由於這種情感，遂生出對於社會的不信任。這不信任起於一種悲觀，於是他們懷疑社會的構造能有任何改變，並相信任何改變都涵有一種危險，最好是不去嘗試牠。

因此，若想使人類對於社會行爲的信心增加力量，定要將國家切斷，將牠的職務分開來。個人屬於較小的保有實權的團體，以處理生產與地方行政事務，這是可以辦到的；他既是團體一份子，馬上感覺得他與政治有關係了，他的意志是有效的，他的工作實在是為社會的。這即如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社會組織應如一種

宗教的自由團體，由簡單而趨於複雜。

政府這機器應該縮小；把牠變成地方的然後就可以支配牠了，因為人們看見他們的政治工作之具體結果，所以使他們感到這是自治，社會可以隨他們的意志而變動，因為社會就是他們自己。這樣組織的社會定可以成爲公益的泉源，無論在工廠裏或工廠委員會裏，而這種泉源在範圍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却枯竭無餘了。

至於說到這樣的社會究竟要不要保存一種中央政府的形式與現在的國家相似，大概說來（這理由在第三章已說過了），這種機關的存在是必要的，因為人類活動影響於別人，他們又不能與別人造成直接關係。爲管理這些活動，一種中央機關是必要的，因為這理由，所以很難說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實際上能以完成牠所希望的和諧。

（三）方法問題 方法問題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討論牠所引起的各種爭點不是本書範圍以內的事。有幾派社會主義者因爲對於現狀無忍耐心和對於進步遲緩



之失望，遂生出一種鹵莽，使他們妄想只有將現社會完全破壞才能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目的。如我們在前面已見過，服膺馬克斯的共產黨就認為這種破壞必須是暴烈的，使牠可以引起長期的內戰，工團主義者總罷工的理論也是基於同一信心的。

然而無論如何，革命的社會主義派所主張推翻資本主義的方法能不能發生預期的效果，這還是很大的疑問。當然，假若馬克斯的歷史定命主義(Historical Determinism)是對的，一到經濟環境成熟了，革命即定會發生，那末，共產黨該不該努力實現那將來定會實現的事，這問題是節外生枝了。簡而言之，假若理論不能改變自定的事實是真的，那末，我們就不必研究某種理想是否比別種好些。

反之，假若革命問題終爲人類意志與努力所決定，那末，我們就必須研究是避免暴烈的革命好些抑採取牠好些。

爲贊成避免暴烈的革命起見，下面的討論是值得注意的。

(A) 當暴烈爭鬥的期中，社會如同在鎔鉄爐裏一樣；牠將來究竟成何種形

式，這是很難——即使不是不可能——預料的。但我們可以斷定的是，這社會一定和革命的提倡者所預期的大不相同。尤其可能的是，階級戰爭遂將一切權力移到那一班人手裏，他們與在資本主義時代從事革命的人完全兩樣。社會主義者的錯誤，就在他們認為革命完成後的國家當權者與現在主張改革的人相似。而其實他們將是一班野心家，貪愛權勢，尤其是熱中保持他們的地位。因為這班人的存在，因為爭鬥時他們急於取得權力，所以想從階級爭鬥中產生出那一種社會，如無政府主義者所希望的，在那種社會裏沒有統治者，人類可以第一次得到實在的自由，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暴烈的革命都涵有一種危險，聰明人最好是不去嘗試牠。

(B) 暴烈的變更引起暴烈的反動。蘇俄的革命是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為引導的，但雖然革命黨仍然保持着政權，他們所主張的主要原理實際上全被拋棄了。國家資本主義，土地私有，中產階級財產的恢復與私營商業，都是今日蘇俄的特

斷；因爲這結果，所以現在蘇俄的社會構造與馬克斯主義毫不相干，正如革命前一樣。現在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將來國家也不會消滅，自由社會也不會來到的。

因爲這種種理由，我們很可以相信，進化的社會主義派之逐漸改造政策比諸暴烈革命和階級爭鬥的方法要能得到較永久——雖然不大驚人——的進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版

一一一〇〇〇

現代政治思想

每部實價 五角

著者 C. E. M. Joad

譯者 夏 葵 如

發行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Ea.  
1.

12